

历史的经验和我们的发展道路

廖盖隆同志在全国党校系统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

1980年10月25日

同志们：

我要讲的题目叫做《历史的经验和我们的发展道路》。我讲的还是老话，基本上是7月22日在中央党校讲的内容。但是，做了些补充。我准备做一些解释。特别是，对于今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实行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改革问题，作一些说明。

我讲错的地方，请同志们不客气地指出、批评。首先讲一个问题，就是建国三十一年以来的党史的轮廓。

一、建国三十一年以来党史的轮廓

我们认为，建国以来的历史可以分为五个时期。这个党史的分期，不是任意要这样分那样分都可以的。我们可以把其中有些时期合起来，但是，合起来，我看还是两个时期。比方说，1949年到1956年，这中间实际上是分成两个时期的，1949年到1952年，这是恢复国民经济的时期，1953年到1956年，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我们可以把它合在一起，这是建国以来的头七年，在这七年内，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也可以这样来分。但实际上这是两个时期。56年以后，57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算是一个什么时期呢？大概可以说是曲折前进的十年。在曲折中间前进的十年，也可以说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中的严重的失误和调整国民经济的时期。这个十年，大概可以分为三段，一段是正确的，路线正确的，一段是犯了错误，还有一段是改正错误。那么，这是第三段了。第四段，“文化大革命”，要打引号，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这十年动乱。第五个时期，就是向着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时期。

现在我就分别来讲一讲，这五个时期的基本内容和一些问题。我讲话以前有些同志希望我讲一讲党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因为这个决议还没有制定出来，所以，还不能讲。我只是就我个人理解的一些问题来讲一讲，所以说这不能称作什么传达。

现在讲第一个时期。就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恢复国民经济的时期，1949年到1952年，三年。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提法，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时期是属于社会主义阶段的。因为这个时候，无产阶级民主政权，已经建立起来了，无产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已经建立了，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已经建立了。因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这样一个政治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这就相当于原来马克思讲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在我们中国的表现形式，叫做人民民主专政，相当于马克思讲的无产阶级政治统治。但是，在这里要说明一下，这里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个概念，是不是很完善呢？看起来不是很完善的。因为即使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那里的人民，不只是无产阶级，还有小资产阶级，还有农民等等。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本身，不能包括这个其他部分的人民也参加这个统治，参与这个政治统治。特别是，这个专政是什么样的专政，也没有说明白。毛泽东同志提出来一个名词，叫做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这个范围是很广泛的，他接着下个定义：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是采取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的这么个方法来进行统治的，所以叫做人民民主专政。那么这个概念，是更科学、更完善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概念——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代替马克思原来所讲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指出这么一点，就是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基本上胜利了。作为政治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49年已经基本上胜利了。这是不是奇谈怪论？我觉得不是。因为列宁讲过，反复地讲过，革命的基本的问题，是政权问题。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建立无产阶级联合农民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的政权，而这个政权已经建立了，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已经建立了，那么这还不是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已经取得基本胜利了吗？在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毛泽东同志曾经批判过的一种观点，就是批判认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个观点。这里毛泽东同志批判的，是指在历史上认为革命不要分阶段的那种错误观点。就是说，在进行民主革命的时候，就去执行社会主义的政策，一般地去打击资产阶级的政策，他批判的是那个观点。但是，我们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发展，到了1945年以后，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这就是我们在解放战争时期提出的革命任务，增加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没收官僚资本，有两重意义，一方面是民主革命，另外一方面又是社会主义革命。另外，我们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在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个人民民主专政概念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专政，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的政权。我这里可以引用一下毛泽东同志关于这个问题有些什么论述。一个就是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一个讲话，他是这样说的：“1949年开始，我们就没收全部官僚资本。民族资本二十多亿，官僚资本总有一百多亿。”这个时候周恩来同志插话：“连帝国主义的资本也有二百多亿。”这是连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的资本了。毛泽东同志继续说：“这一部分帝国主义资本同官僚资本拿到工人阶级的政权手里头，这是什么革命呢？这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讲的，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因为是无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权，无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权、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这个资本的性质就变了。变成是社会主义的了。所以，我们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为什么市场能够稳定，国家能够控制呢？你看十个指头占了八个半，这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呀，十个指头占了八个半，也就是百分之八十五，占了

这么多，这是讲工业。至于农业那个时候还是私人的，到后头合作化了，成了集体的。土地改革的性质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我们不停止在这上面，七年之内合作化就基本上完成了。”这就是说，毛泽东同志自己就肯定1949年没收官僚资本，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因为我们建立了一个无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权，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这个国家也就是无产阶级的了，这是社会主义的了。这是一个材料。另外在1960年初，毛泽东同志关于苏联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面直接讲到了毕其功于一役的问题。他的那个谈话，记录里头是这样说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长时期内，是反帝反封建，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任务。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话，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它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毛泽东同志讲过去那个混淆是不对的，但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这怎么理解呢？恐怕应该这样来理解，在提出反官僚资本以后，就解放战争那个时期来说，是可以的。我们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面是完成了民主革命；另外一方面，作为政治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基本完成了。这不就是毕其功于一役了吗？所以在这个时候讲是可以的，恐怕是应该这样来理解。毛泽东同志讲：“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这是大概的数目，刚才讲是八点五比一点五，这里是讲八比二。“我们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所以我们看1949年革命胜利和胜利后不久，不仅是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且把中国的主要的资本主义都消灭了，经济革命也开始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把官僚资本、把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把它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又说：“帝国主义在我国的财产，其中属于日本、德国、意大利的，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由国民党接收过来，全国解放以后，这部分已经被我们没收了，还有美英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财产，我们用征用的办法，把它征用了，实际上已经把它变为全民所有了。”所以，根据这种情况，我认为，我们可以这样说：作为政治革命的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在1949年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作为社会革命作为社会经济改造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么，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还只是社会经济革命的开始，象刚才所讲的把官僚资本变成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也开始了。后来，在1956年，就基本完成了。所以作为社会经济改造的社会主义革命是1949年开始的，1956年基本完成。为什么说1949年的革命的胜利不仅是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而且是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的基本胜利呢？我把这个道理说了一下。那么，我们说在这一段啊，使用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这就可以把这个时期的剿匪反霸、镇反、土改、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的斗争，党的整顿和建设，没收官僚资本，并且把它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把所有这些都包括在内了，因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就包括了这些任务。如果我们只讲恢复国民经济呢，就很难包括这些斗争或者工作。在这些斗争和工作里面，土地改革是属于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其他各项都可以说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包括抗美援朝，这也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斗争。

如果我们把中国1949年革命的胜利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来比较一下，那就更清楚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是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就是苏联的工农社会主义政权，可是它的政权是很不巩固的。它是城市起义以后建立起来的全国政权，刚一建立就发生了全国性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武装叛乱。后来经过三年内战，才战胜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叛乱和十四个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干涉，才巩固下来。打个比方吧，我们的解放战争是进行在前面，但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战争是在后面进行的，建立政权以后又打了三年解放战争。我们是先打了三年，取得了胜利。所以我们革命一胜利，我们建立的政权是巩固的。而苏联呢？因为还没打过仗，刚刚起义取得胜利，它是建立政权以后再进行三年解放战争，然后巩固自己的政权，这是一点。我们中国的1949年的革命胜利不是比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还要大一点，还要巩固一点吗？

另外一方面，苏联的十月革命胜利不久，他就宣布把全部私人工商业都没收，结果在共产党方面一点准备也没有，实际上管不了那么多的私营工商业，号召工人起来接管，结果把国民经济搞乱了，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以至于后来不能不实行军事共产主义。而我们只是没收大官僚资本，官僚资本的大企业，有多少呢？有二千七百多家。而我们在解放区长期进行了建设，我们准备了一套管理经济的干部，虽然不很多，但管理二千多个企业还是管得过来的，所以有条不紊地接管了这些大官僚资本企业。另外，又收回了一部分外国垄断资本企业，数量有限，这个接收工作很顺利，改造的工作也很顺利。而对于大量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它们一共有几百万家之多，虽然总资本占的分量很少，但是企业数量很大，其中大部分是个体的工商业，一点也没动，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这样做国民经济秩序不发生紊乱，人民生活也没有遭到损失。所以，我们的政治秩序是好的，避免了经济上的混乱和破坏。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中国的革命由于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后，接受了十月革命的经验教训，由于毛泽东同志长期地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所以我们1949年的革命是非常成功的，是非常伟大的。

这一段有一个问题可以研究一下，就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社会矛盾是什么？在北京有一些高等学校的教师，到现在还提出这么一个意见，就是认为这个时期（1949年到1953年）的主要矛盾还是人民大众同封建势力的矛盾，什么原因呢？因为土地改革在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完成，大约在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土地改革的任务没有完成。既然土地改革的任务没有完成，所以，他们认为也就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和封建势力的矛盾，就是说，革命性质还是民主革命的。这个对不对呢？这个看法有部分道理，在新解放区的农村，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农村，那里的主要社会矛盾，的确还是人民大众和封建势力的矛盾，那里在1949年到52年要解决的还是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但是从全国范围来说呢，就不是这样，从全国范围来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经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建立了，在政治革命方面已经胜利了，经济革命也开始了，没收官僚资本，把它改造成国营经济，这个很严重的步骤已经采取了。所以在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社会矛盾，已经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很明显的。这是非常明显的。人民大众和封建势力的矛盾只是部分的新解放区的农村的情况。新解放区的城市，也不是这

个样子，全国范围也不是这样。新解放区的城市也要没收官僚资本，在那里也要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怎么能说还是民主和封建的矛盾呢？

那么到底是什么呢？主要的矛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即到1956年，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应该说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里头，这七年里头还可以分两段来看。头一段就是恢复时期，1949年到1952年。这三年主要的社会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大资产阶级以及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的矛盾。因为我们中国的资产阶级，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分析，可以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大资产阶级这两个范畴。上面我们已经讲过，工人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在解放战争时期，形成尖锐的对抗性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我们可以讲，三年解放战争，一方面是我们要解决中国人民同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矛盾，这是民主革命。另外方面，是要解决工人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有两重性，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革命带有两重性。那么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非常对抗性的矛盾，已经因为工人的胜利而基本解决。但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仍然存在着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地主阶级残余势力的矛盾，这还是对抗性的矛盾。在1949年到1952年这个时期，这仍然是主要的社会矛盾。它可以说是残余势力，但这个残余的力量也不小。国民党的残余的武装力量当时在大陆上有一百多万，反革命分子呢，包括他们留下的特务，以及历史反革命，一共有几百万，后来我们大家都知道，被我们镇压的就有七、八十万，在镇反运动中间，关起来的、管制的还不算，总数目大约有几百万。所以，在当时剿匪反霸的斗争，当时进行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追击战，当时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这两项运动，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主要的表现形式，主要的斗争形式。到1952年，这个矛盾基本上解决了，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残余武装力量已经被我们消灭了，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在大陆上的反革命分子，留在大陆的反革命分子的主要的力量、主要的部分也被消灭了。1953年到1956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我认为可以说是主要表现在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或者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人民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和斗争的主要形式，就是人民政府要限制要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资本家的一部分右翼分子的反对限制反对改造之间的斗争，也就是限制、改造与反限制、改造之间的斗争，这就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斗争的形式。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的说法，“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之间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在我们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那么根据毛泽东同志这个说法，可以看出来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这个矛盾是可以和平解决的。就是在经济上用和平的赎买的办法，在政治上思想上用给民族资产阶级成员以出路，就是给予选举权，给予适当的安排，和给予改造的办法来解决。这就是用和平的方法来消灭资产阶级，来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这是可以做得到的。因为正象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这是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头~

说的一句话了。根据后来历史情况的发展，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我们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这是头一个时期。

第二个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3年到1956年四年。这个阶段的最伟大的历史成就，就是按照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因此使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原来在1949年，就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到这个时候又在我国建立了完全的或比较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变成了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了。我们的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我们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所以我们的国家就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

当然，这个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它的初期发展阶段，还是发展中的、不够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说是发展中的、不够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呢？有两个理由，一个理由就是我们的生产力还很落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它应该是建立在工业化的大生产的生产力的基础上的。但是我们的国家是落后的国家，生产力还很落后，我们的大部分的经济部门还是使用手工劳动，没有使用机器。所以也可以说是，因为我们国家很落后，在中国出现的社会主义，相当大一部分还是小生产的社会主义。这样说起来似乎很奇怪，但是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资本主义，它也有手工业的时期呀，如工厂手工业时期，有机器工业时期的资本主义。那末我们社会主义不也可以有手工业时期吗？我们现在的手工业，以及用手工操作的农业，的确它又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个体私有的。这就是说，我们虽然是社会主义，但是这是落后的，生产力很落后。不是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而是大部分还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剥削阶级的残余还存在，工农之间的本质差别还存在，当然别的差别，例如城乡的基本差别，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之间的很大的差别都还存在，因此，在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作为残余形态还存在。1956年以后，还存在着剥削阶级残余，又存在着阶级斗争的残余。由于剥削阶级的残余存在，所以阶级斗争的残余也就存在。我们使用这个概念，剥削阶级的残余和阶级斗争的残余，是为了区别于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情况，因为1956年以后，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它只剩下一个残余形态，主要的矛盾已经转移到别的方面去了。在我看来就是转到人民内部矛盾了。毛泽东同志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那个时候发表的讲话本来讲的意思也是这样。说主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就是说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吗！主题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方法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所以，什么叫做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呢？就是生产力还很落后，就是还存在着剥削阶级的残余、阶级斗争的残余。不管怎样，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胜利的基础上建立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是一个伟大的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个变革的意义的重大，可以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相比较，相比拟。到这个时候为止，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是很成功的，基本上是很成功的。实践证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路线是正确的，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

有些同志不承认这一点，不承认我们已经基本上消灭了剥削。不承认我们党这样做

是正确的。认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太早了。不承认我们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路线是正确的，不承认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认为这些意见是不对的。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不能认为我国这个阶段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只有成绩没有缺点，作为第二位的问题缺点和错误还是存在的。

主要的缺点，一个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后期，主要是从1955年开始，出现了比较急躁，工作中间比较粗糙的现象。所谓急躁，就是说，不照顾到生产力发展的情况，群众觉悟的情况，千篇一律一下子就实行高级合作化。比较粗糙，就是采取了简单划一的办法，留下了不少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一年一个高潮，无论在农村在城市在改造中间都遗留了一些问题。拿城市来说，象陈云同志讲的，我们社会主义改造把一些不应该取消的小东西取消了。拿现在来说，可以说我们把城市里流动的商业服务业小工业网点，商业服务业的网点缩小了，过分地缩小了。举北京来做例子，1956年全市有五万多个商业服务业网点，改造以后，一直到现在只有一万多个商业服务网点，就是差不多去掉了四分之三吧，大大减少了服务业的网点。这样子，老百姓的生活就很不方便。把一些小的修理这个那个的或者是制造些小工业品的小东西的这么些工业取消了。

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1954年出现了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急躁冒进的倾向，被纠正了。1956年又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基本建设的开支超过了我们国家能够提供的资金，大概超过了三十亿左右，三十亿人民币。这个时候领导国务院工作的以及领导财经工作的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发现了、提出了并且实行纠正急躁冒进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后来毛泽东同志批判反冒进是错误的。既然是冒进就应该纠正，是理所当然的。应该把它纠正。

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问题，邓子恢同志提出过要注意合作社的整顿和巩固，这些意见是正确的。把邓子恢同志称右倾机会主义者，称为小脚女人，是不对的。他不是右倾机会主义，不是小脚女人。

第二个缺点，当时已经存在一些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因素，从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就包含了这种因素，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因素。很明显的，现在平反的冤假错案里头有些案件就是属于那个时期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在我党历史上的历次的运动包括建国以来的各项政治运动，都带有左的倾向，都带有左的偏向。这些运动都是从反右倾开始，往往是主观地确定打击的比例，还有所谓矫枉必须过正的不恰当的说法，因此扩大了打击面。这种运动中的左的现象，因为在领导这个运动的时候，我们党所采取的有些方针偏左而产生的。我们知道在苏区的时候就存在着肃反扩大化，在延安整风审干的时候，也有部分的扩大化，后来在土改整党之间，三查三整运动也有这种问题。建国初期，无论是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改造、镇反，后来的肃反，特别是肃反，反胡风这些都带有这些毛病，都带有这些左的倾向。反胡风是搞错了。整个胡风案已经搞错了。中央已经发了文件，不久以后还要登报。人家不是一个反革命集团，他有一些错误，但是他不是反革命，不是反革命集团，应该给人家平反。历来搞的各项运动都带有左的偏向，是这么个情况。建国初期以来，同样带有左的偏向。

第三个缺点，就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出现，党的领导人就开始有一种过分估计生产发展的高速度，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和政治作用的因素。这个反映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的序言和按语里面，都有这个倾向。这反映出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我们党的领导人开始骄傲了、不谨慎了，开始陷入了急于求成的空想。所谓大跃进的错误，这个时候已经在萌芽，在发育了。所以什么时候开始有“大跃进”这么个思想呢？大概是在1955年，大家可以去看看《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和按语，到处都表示这个，都表现了这个思想，急于求成的思想。

第四个缺点，就是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我们是基本上照搬苏联的。党的领导人从1956年开始，就感觉到这样做是不对头的，所以有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周恩来同志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其它的著作。还有陈云同志的八大发言。不过在这方面还来不及加以改正，以后实际上也没有改变。我们这个国家的经济计划体制差不多完全是照搬苏联的，到现在还没有改变，没改变过来。有一些问题我们虽然没有照搬苏联的，但是它的意义也差不多，比方一长制的问题，我们不叫做厂长负责制，我们叫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我们实行的实际上是党委书记说了算的制度，他和一长制又有多少大的差别呢？实际上没有多大差别。

总而言之，我们在大略的考察，概括的考察里头，这个阶段党的路线和工作是取得了很大胜利和成就的，但是仔细地去分析，仔细去考察，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成绩中间还有不少缺点。

在这个时期进行的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阴谋活动的斗争是必要的，斗争的方针方法也是正确的。因为高岗、饶漱石他们的确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反对刘少奇同志，反对周恩来同志，企图做党的副主席，并且要当国务院总理。他们进行了很多活动，挑拨离间。因此，反对他们分裂党的活动的斗争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斗争的方针、方法也是正确的。这个问题是不能翻案的。这个斗争对于巩固党的团结统一和抵制苏联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对于保证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起了重要的作用。为什么说这个斗争对于抵制苏联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有重要的作用呢？因为高岗是得到苏联支持的，是得到斯大林支持的。斯大林把高岗看作是中国现代的张作霖，是个地方军阀。因为当时张作霖一方面依附于日本，另一方面也依附于俄国。他把他看成是地方割据的一个首脑人物。如果说有什么人里通外国的话，那么高岗就是一个，彭德怀倒不是的。高岗是里通外国的。因此，我们粉碎高岗、饶漱石的分裂党的活动阴谋，对于抵制苏联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1956年9月举行的八大，在党的历史上有重大的意义，八大对于阶级关系和主要任务的变化，做出了正确的估计。八大指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那么这就是八大对于国内形势的分析，阶级关系的分析。那么，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在这种变化了的国内形势下面，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因此八大提出的主要任务实际上是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间的任务，发生了战略性的变化。以前的任务是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这还占很大的成分，到这个时候呢？主要任务是

发展生产力，不是进行阶级斗争，不是改变生产关系，而是发展生产力。八大提出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这个问题我就不多讲了。同志们听说都做了很详细的讨论。但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当时没有看到，或者没有认真看待这个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的这方面的情况，因此，后来作为残余形态表现出来的一些阶级斗争的现象面前，又发生过夸大它的严重性的情况，以至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陷入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一些问题。

第三个时期，在曲折中前进的十年，或者叫着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中的严重失误和调整国民经济的时期，1957年到1966年上半年的将近十年的时间。这十年是曲折地前进的。它包括了路线正确、错误、正确的过程。党的路线在大部分时间里基本上是正确的。开头的一段还是正确的，特别是1957年1月到5月的这一段，如果从八大结束时算起，自1956年10月到1957年5月。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工作中，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毛泽东同志在八大以后，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社会矛盾的变化作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指出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重大发展。这个路线是正确的，而且是很正确的。然而，接着从1957年5月到12月，在反右派斗争中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我这样讲不是要肯定反右派的斗争，恰恰相反，我这里讲的是这个意思：当时对于极少数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批判，对广大的群众进行教育是必要的。现在我们这样做也是必要的，现在也还有一些右派分子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但是发动一场全国范围的划右派分子的群众运动是错误的。所以这里讲的就是反右派斗争这个运动的本身就是错误的。这个错误的性质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扩大化到什么一个情况，现在已经比较清楚了。据统计全国的右派分子大概有55万人，一些在农村里头划的叫做反社会主义分子呀，什么等等，或者没有名称的，那就更多了，恐怕总有几百万人。那些没有统计的不算。这55万人到现在为止清查的结果，有98%都搞错了的，都改正了，只有2%现在没有改正。在没有改正的人里头，有些他的确是犯了算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错误的，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这就算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标准了。但有些，他是因为说了些不正确的话，但有的历史上又有些问题，历史上比方说是历史反革命，这些人就不给他改正。所以这2%里头，还包含了一些老帐新帐一起算的问题。可能有一些还不够这个右派分子的这个标准的。再说，这些右派分子是不是一定要划，一定要戴帽子？完全可以不划，大家知道他有这个错误就行了。我举个例子来说吧，很有名的梁漱溟，他是经常要批评共产党甚至反对、攻击性的言论也有。我们党对他进行了批评，批判他的错误言论，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没有给他戴帽子。什么时候给梁漱溟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呀？没有，到现在没戴。不但没有戴，而且他还是政协委员，最近他还被提升做政协常务委员了。那么留他在那里做样子让大家看，我看也没有什么害处。所以戴右派分子帽子这事啊，是不必要的。反右派斗争本身就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不过从当时整个党的工作来看这个错误还是个别的严重的错误，还没影响到党的全部工作。这是什么意思呢？1957年从5月中旬以后到12月恐怕还不能说党的路线是错误的，基本上

还是执行正确路线的。因为这一年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从反右派斗争的后果来说，反右派斗争中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的影响是严重的。因为反右派斗争中间采取了一个所谓“四大”的方法，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用“大字报”来围攻这么个办法。有的时候也叫做鸣放辩论的方法，这是一种强制的方法，是一种强制的对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方法，所以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方法。反右派斗争中的这种方法后来就运用到所谓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间去。反右派斗争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造成以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都是反右派运动的错误发展和进一步的扩大。这是一段。1957年这一段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958、1959、1960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失误，并且是全局性的，影响了和包括了党的全部工作的错误。所谓“大跃进”的错误，“大跃进”，我们现在是把它打上个引号，因为实际上不存在什么大跃进。“大跃进”的错误是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批判反冒进开始的，批判反冒进就是要冒进，就要号召在全国实现个大冒进。这一年的3月，1958年的3月，党中央在一个文件里头正式号召“大跃进”，打了引号的“大跃进”。3月的成都会议毛泽东同志甚至这样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写在历史上应该说是很滑稽的。冒进就是冒险盲目地向前冲，叫做冒进嘛！冒险地前进嘛！冒险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冒险倒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就是从文字上来说，也是违反逻辑的。可是他老人家居然地说得出这种话来。批判反冒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批判周恩来同志，也批判陈云同志。所以，批判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的反冒进开始了一个大冒进，这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过高的指标，而且终于拍板定案，到了7月8日就定了下来，在这一年钢要翻一番，粮食也要翻一番，这是根本做不到的，完全不可能的。按照现在我们知道的经济发展速度，不管在哪个制度下，一年翻一番，根本没有这可能，现在还没有过这样的奇迹，但是当时毛泽东同志就是要创造这样的奇迹。在这个高指标下，号召“大跃进”。在确定钢铁翻番、粮食翻番的高指标下，还加上个人民公社运动。刚建立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没有巩固下来，又不让它巩固了，马上就翻上去再提高一级。人民公社化运动本身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把很多穷富不等的队，把它合并在一起，统一核算，这不是穷富拉平了吗？这不是共产风吗？其次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完全拿来充公，这不是共农民的产吗？共富队的产，共农民的产。这股共产风是党中央确定人民公社化运动本身就包含着的因素，必然要这样，必然要刮共产风，因为它本身规定的就是剥夺农民的办法，要把穷富不等的、好多个高级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一个人民公社，要取消自留地，就是这么一个办法。所以不能说刮共产风是基层干部在那里刮的。不是的，是我们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决定要实行人民公社本身就包含了刮共产风。这就是一个剥夺农民的错误的办法。现在人民公社这个牌子还在挂，但是实际上原来人民公社的内容已经不存在了，什么一大二公，工农商学兵，统一好领导，这个人民公社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当然，现在还叫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这两个运动，就是全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

会主义改造的工作，都是用群众性的鸣放辩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方法来强制推行的。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同时，党的领导人又陷入了急于求成和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左”倾的空想，或者象彭德怀同志所讲的陷入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是说到要点上去了。当然正象邓小平同志所讲的，党中央的其他的领导同志对这个错误也有责任，对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当时也有责任，因为他们的头脑也发热了，以为可以快一点过渡到共产主义，所以表示赞成。但是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错误要负主要的责任。毛泽东同志首先提了所谓“一大二公”的公社理想的这种先验的模式，北戴河决议里头关于过渡到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将来的事的宣告，宣告了这样一个论点，很快地就可以过渡共产主义去了。还有毛泽东同志在北戴河的讲话，1958年七、八月在北戴河发表的一个讲话，主张废除工资制度而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式的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党的领导人的思想里头有一个相当成系统的“左”倾空想的社会主义，或者叫做绝对平均主义的农民共产主义。当时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共产主义或者这个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是空想的，是代表农民的那种平均主义的偏见的。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在58年底发现了工作中间有“左”的错误以后，开始采取措施来限制这种“左”的错误的发展，并想加以改正。1959年上半年继续做纠“左”的工作，但是纠“左”是在肯定所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正确以至于完全正确，所谓伟大成就这个前提下来进行的。所以理所当然地遇到了阻力。底下执行了这个“左”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这个“左”的错误路线的各个省委书记以及各级干部也想不通，你说我执行这个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又批评我工作中间有“左”的错误，他就不承认有“左”的错误。很多人都不承认，这样子所谓纠“左”就遇到了阻力。在“左”的错误还没有根本纠正的情况下，或者说基本上还没有纠正的情况下，1959年下半年又错误地批判了提出正确意见的彭德怀同志，错误地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就使得“左”的错误发展得更加严重，更加不可收拾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0年下半年。所以全局性的错误大概持续了两年多到三年。我个人是这样看的。我认为，如果说1958年到60年的“左”的错误，只是局部性的错误而不是全局性的错误，我认为是说不通的。我认为应该干脆地指出，明确地指出，1958年到1960年毛泽东同志犯了“左”倾路线的错误。现在有很多同志也是这样讲的。我赞成这个意见。

党的领导的错误是造成1960年到1962年三年困难的主要因素。这三年困难使得我们的经济建设遭到了重大的损失，使得中国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同志们都知道，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意思，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是什么意思，饿死了多少人？比方在你们安徽饿死了多少人？党的领导工作中间的错误是造成1960年到1962年三年困难的主要的因素，加重这个困难的是另外两个因素，就是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退专家。对于苏联压服中国和控制中国的狂妄企图，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进行了坚决的英勇的斗争，粉碎了他们的阴谋，这个斗争是完全正确的，是有很大的历史功绩的。毛泽东同志敏锐地观察到苏联已经变修了，变质了，并且做出了一些正确地分析。比方他在关于苏联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头指出，苏联的宪法，以及苏联的经济学

教科书空谈苏联劳动者有这个权那个权，比方说有受教育权、劳动权、休息权，唯独不承认他们有管理国家和管理文化教育这个最大的、最根本的权利。这个分析我认为是对的。又比如他指出苏联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东方西方的学者都指出，苏联特权阶层是在斯大林时期就形成了的，赫鲁晓夫把这些继续下去了。我认为这些分析都是正确的。当然，毛泽东同志和那个时候的党中央对于苏联的变修也做了些错误的解释。比方把按劳分配、奖金、利润等等都说成是修正主义，这就不对了。“九评”里头包含了一些错误的解释。但是我认为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在本质上还是正确的。

因为发现情况严重，1960年11月党中央发出了彻底纠正“五风”的紧急指示，这个时候起开始认真地改正“左”倾路线的错误。12月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李富春同志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实施八字方针。1961年、1962年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李富春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来调整经济，很快就收到了成效。1961年到1966年，是党为纠正错误而斗争的六年，这六年党实际执行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

所谓基本正确，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间的错误是由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同意之下基本上纠正过来了。纠正“左”的错误当时起了主要作用的是哪些同志呢？毛泽东同志在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可以说是起了主导的作用。他主持制订了十二条以及后来的六十条。在其他方面呢？其他方面纠正“左”的错误那是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邓小平同志起了主导的作用。也不能说毛泽东同志自己没有做纠正错误的工作，但是大量的工作是其他同志来做的，大概是这个情况。另外一方面，他就是纠正“左”的错误，也没有指出他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误，这个他是不承认的。反右倾的错误大部分纠正了，大部分戴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同志，给摘掉了。但是纠正得不彻底。庐山会议的错误的决议没有撤销，彭德怀同志、黄克诚同志、张闻天同志、周小舟同志，他们的问题没有得到平反。反右派斗争中间扩大的错误虽然已经提出来了，但是没有纠正，他拒绝纠正，说反右派斗争的问题，不存在平反的问题，因此一句话下去，也就纠正不了。总起来说，对于“左”的错误思想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没有加以清算。谁都不能够说这是一个“左”的错误路线，不能说这是一个“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不能这样说。就是1962年这个总结历史经验的七千人大会，也是很不彻底的，是在肯定所谓党的路线的正确底下来总结经验的，这个就不是实事求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是路线的错误，这是很明白的。1958年的总路线到底对不对，这个问题可以研究。过去我们一直说1958年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对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同志认为，这个路线是不对的。他们认为这是主观主义的总路线，因为它只要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去建设社会主义，至于采取什么方法，采取什么方针，怎样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在这里是没有反映的。这个总路线开头只有十二个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就要求快快快，要大干快上，就是这个，这就很难说是正确的路线。这个问题可以研究。我们也可以暂时不作结论。但是实际的工作，所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它所推行的是高指标和共产风，这个当时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对于这个当时没有清算。没有分析这个错误

从那里来的，根源在什么地方，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左”倾的错误。因为彭德怀的事发生以后谁也不敢讲这个问题了。彭德怀讲得很正确，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彭德怀同志，当时也没有说是路线错误。这个更不敢说了。他说路线是正确的，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工作中发生了左的错误，这个左的错误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纠左比纠右反右还要难，要很重视这个纠“左”的工作。他作了这个发言以后，他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也没有提出这个错误的性质问题，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更没有清算它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所以我们在上面讲，基本上是把那个错误纠正过来了，在实际工作中纠正过来了，但思想上没有纠正。思想上甚至没指出这是一个全局性的“左”倾的路线错误。由于“左”的错误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没有清算，因此就不可能彻底纠正，更不可能避免重犯。所以，1958年的错误同后来的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有内在联系的，是不能割断的。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间的“左”倾路线错误，是1958年到1960年的那个“左”倾路线的进一步的登峰造极的发展。

由于对“左”的错误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没有加以清算，因此就不可能彻底改正而避免重犯，相反地“左”的错误思潮还在继续发展。1962年9月的十中全会，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阶级斗争，要年年、月月、天天讲阶级斗争的错误论断。这就出来了一个新的因素，在反右派斗争中，反右派斗争以后一段的时间，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对国内形势的分析。上面不是讲了嘛，八大讲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在1956年基本解决，但是反右派斗争中和反右派斗争结束以后，在毛泽东同志的多次讲话，我们党中央的文件里头，反映出来的是轻率地把这个估计推翻了，认为主要矛盾还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这个特别清楚地反映在1958年5、6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和其他文件中间。到了八届十中全会就把这个主要矛盾的时间更延长了，延长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就在这时候有了一个新的发展，把这个错误的论断延长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以后的四清运动，也就是在这种“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指导下发生的一个错误。虽然这还是局部性的错误，因为全国农村三分之一进行了四清，还有三分之二还没有进行四清。当时党的整个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从大的方面来说，基本上还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成绩还是主要的。

1965年1月的“二十三条”对纠正四清中间的“左”的错误尽管起了一定的作用，解放了一些基层干部，但是，更重要的是“二十三条”在三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一个就是认为中国无论在城市农村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这个形势估计是完全错误的；第二个是提出了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两条道路斗争为纲，认为我们建国以后的十多年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所以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两条道路斗争为纲；第三，就是提出了一个不科学的“走资派”的概念。这些就为以后的“文化大革命”的更加严重更加长期的全局性的错误，作了思想上、理论上和舆论上的准备。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三个时期。

第四个时期，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从1966年6月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为止，有将近十年半时间。

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对于“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左”倾路线错误，

事实上已经作了结论。四中全会通过的去年叶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指出，“文化大革命”从形势估计到斗争的方针方法都是错误的。五中全会的公报说，党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令人痛心的错误。事实上这些提法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长期的全局性错误，是一个长达十年之久的“左”倾路线错误。

毛泽东同志是这一场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他要对这个错误负主要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毛泽东同志可以说要对这个错误负主要的责任，就是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这个运动是他发动的，特别是有很多的同志被打倒以后，靠边站以后，他们就不能负责了。

周恩来同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还继续工作的那些同志是处在十分困难的地位。幸亏有周恩来同志的努力，才减轻了文化大革命“左”倾路线所造成的损失。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周恩来同志始终反对派性，反对打倒一切，反对全面内战，始终坚持团结、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继续进行生产，维护和恢复工农业生产。因此，周恩来同志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对党的事业作出了特殊的杰出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所以成为浩劫，成为悲剧，是因为林彪、“四人帮”利用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左”倾路线错误，并且把它推向极端，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反革命大破坏。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破坏是有联系的，因为毛泽东同志除了提出“文化大革命”这条“左”倾路线错误能够被林彪、“四人帮”所利用以外，还重用了林彪、“四人帮”。但两者之间还是有本质的差别。因为毛泽东同志的问题还是共产党员犯了“左”倾路线错误的问题，还是属于好人犯错误，他的主观愿望还是为了实现社会平等的理想，尽管这种理想象前面所说的是“左”倾的空想。但是林彪、“四人帮”是一些野心家、阴谋家，他们的问题是属于反革命进行破坏的问题，他们从事的是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勾当。

“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和主要方面，是错误，是灾难，是浩劫，是黑暗。但是这十年中间也有光明的一面。在这十年中，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进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主张建立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在对外政策中，基本上坚持了革命的和平的外交路线。这当然不是说，在对外政策、路线方面，就没有一点缺点了，比方有些过“左”的东西，也影响了别的国家的革命运动。但基本上坚持了革命的和平的外交路线，并为此作了大量的工作。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相当严重地离开了毛泽东思想，作为离开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思想，但是他又没有完全离开，因为他始终没有把最高权力交给“四人帮”，还对他们有过批评，并且解放了不少的老干部。这些就使得我们党后来比较容易地粉碎了“四人帮”。

在这期间，广大的群众，广大的干部，特别是老一辈的革命家，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继续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坚持党的“八大”和“八大”以前的正确的路线，对于“左”倾的错误路线进行抵制，特别是对于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破坏，用各种方式进行了反抗和斗争。这就证明，在十年动乱中，我们的党还是存在的，党的事业没有中断。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已经改变了性质的看法是不对的。党的事业没有中断的最确凿的证据就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遇

到了广大干部、广大群众的抵制的所谓“阻力”。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崇高的威望，和毛泽东同志以及党中央长期以来进行的反修防修的这种宣传的影响，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的时候，的确亿万群众是拥护这个大革命运动的，亿万群众是参加了这个运动的。但是，很快没有几个月，很多的群众，广大的干部，党团员多数，特别是老工人、老农民就看清楚了，把所有的老干部都打倒，这到底对不对？把所有的党委都打成黑党委到底对不对？所以多数的同志对于这样作，表示不同意、表示怀疑、表示反对。所以，多数的党团员，多数的干部和群众，很快被打成所谓的“保守派”、“保皇派”。这就是所谓的各级领导，各級的党委，很多的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很不认真，很不理解，很不得力。”这就是“文化大革命”遇到的“阻力”。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是得不到多数人拥护的，多数人是不同意的，是有抵制的，有看法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事实是，1967年2月，就在中央领导机构内部，发生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针的所谓“二月逆流”，这本来是正确的，因为多数同志的意见认为这样作不对嘛！副总理、军委副主席中间的多数，相当多的同志，起来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结果呢？他们被打成了所谓的“二月逆流”，所谓“最大的反党事件”，这是第二个事实。第三个事实，特别是到了1976年4月，广大的中国人民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左”倾路线错误再也不能忍受了，因此千百万人走上街头去悼念周恩来同志和反对“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同时抗议错误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都是党和人民中的健康力量、革命力量所进行的反对“左”倾错误路线，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破坏的英勇斗争。特别是1976年4月5日前后的规模空前的革命群众运动，或者叫作“丙辰清明”运动，是中国人民的新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开端，它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可见，在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是交错着正确与错误、革命和反革命的复杂的斗争的。并不是那个十年，只有黑暗，没有光明，并不是漆黑的一团。这是第四个时期。

第五个时期，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是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过去四年了，但是还没有结束。

这个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本来从1957年就已经开始了。但是由于党的领导的严重失误，发生了两个曲折，使全国工作着重点进一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时间，耽误了将近二十年之久。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我们在下面还要说这个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发展的道路还是曲折的。有的人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中间“左”倾路线，继续坚持这个左的路线，提出了两个“凡是”，因此就妨碍了党中央重新确立党的“八大”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只是到了三中全会，经过两年的曲折的斗争，在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才重新确立了和发展了党的“八大”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三中全会以后这一段，可以说，是党的路线最正确的一段时期。而且党的正确路线已经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上大见成效，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看到党的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那么，对三十一年来党的工作的基本评价是怎么样的呢？总起来说，我们党和全国人民，三十一年来是作了英勇的伟大的斗争。尽管发生过两次全局性的左的错误，但是在三十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党的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因此我们取得了四个方面的伟

大成就：

(一) 打倒了反动派，赶走了帝国主义，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虽然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还不完善，党和国家民主生活和法制还不健全，但是我们的党员和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我们一定能够改正过去的错误，我们一定能够建立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二) 消灭了剥削和剥削阶级，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是我们建国以来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消灭了剥削。

(三) 我们发展了经济和文化，虽然我们的主要任务即消灭贫困、落后，还没有完成，但是我们毕竟是为四个现代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四) 维护和巩固了我们国家的独立和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先后进行了英勇的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和英勇的伟大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坚持了国际主义，尽自己力所能及甚至超过自己的能力范围，去支援了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这就使我们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地位和威望，并且终于争取到了，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三中全会以后，终于争取到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空前有利的国际条件。现在我们的国际条件是很有利的。

总之，我们做到了消灭剥削，但是还没有做到消灭贫困落后，这就是社会主义阶段的三十一年党史的基本总结。

我们犯了两次大错误，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和失败，但是挫折和失败终于教育了我们党，使我们开始比较深刻地认识了继续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客观规律，终于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建国三十一年来党史的轮廓。

二、“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和经验教训

对于一个郑重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仅仅指出我们犯了什么错误，以及什么人对错误负主要责任，这是远远不够的。列宁在《“左派”幼稚病》这本书里头说得很对：“一个政党对于自己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

那么，“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党的领导人为什么会犯这个令人痛心的错误？这是有待于我们，包括在座的同志们去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以下只是说一些初步的大概的想法：

第一、“文化大革命”直接就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的产物。我们的党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产生、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同志更是长时期地站在这个阶级斗

争的旋涡的中心。长期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形成了我们党的、首先是毛泽东同志的把阶级斗争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甚至于过分估计阶级斗争的意义的观点。尽管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一度作出了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这个正确的估计，但是只要一些阶级斗争的现象重新出现，而且阶级斗争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阶级斗争残余的形态，只要这种现象重新出现，我们就很容易认为阶级斗争仍然是严重的存在，认为抓阶级斗争仍然是最重要的工作，认为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一切，对待一切。现在有些同志还坚持这个，对什么问题都要作阶级分析。1957年5月中旬以后，由于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发表了一些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是毛泽东同志，其次是全党，又重新转到强调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去，并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陷入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应该说，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剥削阶级的残余和阶级斗争的残余是仍然存在的，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存在，对这个剥削阶级的残余和阶级斗争的残余，我们不应该忽视。那么，毛泽东同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于毛泽东同志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这样严重的估计。下面我们分为五点来说：

（一）认为在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1956年以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认为在我们的城市和农村，还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不但从前的剥削阶级总是人还在心不死，这是毛泽东同志喜欢说的一句话，说他们人还在心不死，而且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集体的农业仍然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是毛泽东同志从列宁的《“左派”幼稚病》这本书里头搬来的一句话，就是小生产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列宁讲的是没有合作化以前的农村，讲的是小生产者的农村。而毛泽东同志把这个搬到我们已经完成了合作化的情况中来，这个情况是根本不对的。而且进一步我们问，即使在小生产者的情况下，是不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列宁那个说法是不是也有点夸大了？就是在小生产的条件下，这个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现象，可以说有一些，但是你要说大批地每日每时地产生了，这还是夸大了。就是说，我们对于列宁的那段话也可以做一种判断，他也有点夸大了。那个时候也夸大了。在集体农业的条件下，这样说基本上是不对的，不会有这样的事，不会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会是这样的。不单是这样，毛泽东同志还说，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机关工作人员的一部分，共产党员的一部分，也有这个情况，就是说，也产生资产阶级。他是说国营工厂工人的一部分，我们机关工作人员的一部分，共产党员的一部分，也在变成资产阶级。张春桥特别讲“几个一部分”，说毛泽东同志讲了几个一部分都变成了资产阶级了。这样，我们看到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一方面老的剥削阶级总是人还在心不死，这个情况一点也没有变，那么，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阶级，毫无效果。旧的剥削阶级人还在心不死，一点也不能改变，连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老老实实劳动的人，也还是人还在心不死。另外一方面，新的剥削阶级又大量地产生。从哪产生呢？就是从农民里头，从工人里头，从机关干部里头，从

共产党员里头，不断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量地产生资产阶级。那么，资产阶级不是越来越多了吗！阶级斗争不是越来越严重了吗！这是根本不对的。这是毛泽东同志把这个阶级斗争扩大化了，这是第一个方面。

(二)认为不但是旧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在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教育改造之后，在他们实际上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了十多年之后，几乎全部都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点也没有变化。不但是这样，而且我们自己培养的、新学校培养出来的新的知识分子，据说，由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由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续统治我们的学校，这样，培养出来的新的知识分子世界观几乎是资产阶级的，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所以也几乎全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我们共产党无产阶级不但毫无力量，没有力量，没有能耐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过来，而且我们的工农子弟在进入学校以后，也变成资产阶级了。据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这样，在他老人家看来，资产阶级不是越来越多了吗？

知识分子是不是资产阶级呢？是不是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不是的！毛泽东同志在这里的论断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把知识分子看成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不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因为，知识分子是一个阶层，是一个社会阶层，它是由为各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一般说来，在旧社会里头，可以说，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可以说是属于小资产阶级。但是，我们要知道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是很不同的东西，我们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把知识分子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把为社会主义服务了十多年的知识分子还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更错误的。把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统统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更错误了。把他们说成就是资产阶级这就更加错误了。而且，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这个概念，实际上扩大到所有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里面去了。所有出了名的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虽然毛泽东同志没有明确地讲，所有出了名的都是反动学术权威，但是，从“文化大革命”中间他保的人，不保的人就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他是把他们看成反动权威了。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说，我保两个人：保两个历史学家，一个是范文澜同志，一个是郭沫若同志。保这两个人，我保他们，不要把他们打成反动权威。那就是告诉人们，除了此两老以外都是反动权威。所以，知识分子就倒了霉了！只要是出了点名的，有点代表性的，有点成就的，全部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都在批判打倒之列，这是第二。

(三)不但党外产生着资产阶级，而且党内、军内、政府内，也产生着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最后还说，在1976年四号文件里头是这样载着的，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段话已经公开在报纸上发表了。据说这是毛泽东同志当时最新的指示，而且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召开的庆祝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一百万人的庆祝大会上，吴德同志的讲话，引用了这段话。所以这段话是很有名的，而且是肯定的。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

资派还在走。根据这个，“四人帮”就提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而且，据说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部资产阶级的主体，提出了这个论点，你说他有根据吗？我看有点根据，因为毛泽东同志明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嘛！这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你说这是“四人帮”歪曲了毛泽东同志的论点吗？没有歪曲。毛泽东同志讲的实际上就是这样，主要的革命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所谓的党内资产阶级，因此，主要的革命战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战场，现在是在共产党内。这就叫做“共产党整共产党，一整就往死里整”。有个话剧里头一个老工人不是讲吗，“怎么老是共产党整共产党，一整就往死里整。”这是有一个理论根据的。这就是说，有一个所谓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所以要在党内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党内去反对资产阶级，这是第三。

(四)认为所有这些资产阶级分子，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所谓“我们”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毛泽东同志这样讲的时候已经把自己放在那个造反派的一面了。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我们同他们的关系也只能是专政或独裁的关系，决不能是别的什么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的关系等等。这就是说，对我们党内各级的领导人，就是所谓的走资派，对我们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或者是旧社会过来已经长期为社会主义服务了的这样的知识分子都不能和平共处，不能对他们讲平等，而要对他们实行专政、独裁。这就是毛泽东同志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理论的第四个组成部分。

(五)认为这个阶级斗争会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会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们问问毛泽东同志他老人家，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呢？根据是什么？理由是什么？你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理由和根据是什么呢？他老人家是没有说明的，他也不能说明。这是武断的，他只是断定是这样而已。他讲不出什么理由来。开始的时候是说要用阶级斗争，用政治来统帅一切，开始他还沒有否定还要从事生产，还要进行科学实验，而且他还说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这样的话。但是接着，他实际上认为只要抓阶级斗争就行了，因为他在1963年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就是说，只要抓了阶级斗争就行了，其他问题就全部解决了。并且他还默认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批判，认为谁要抓生产就是修正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阶级，这是列宁一再说到的，而且这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同志这个时候甚至连社会主义要消灭阶级的任务也没有提出来。他只是说，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都不能消灭阶级，阶级都要存在，这就否定了列宁所讲社会主义要消灭阶级这个论断，也就是说离开了列宁主义，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那么，在这以后，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结束以后，阶级斗争是不是会消灭？和为什么会消灭？也没有说明。我们假定，毛泽东同志讲的是对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走资派还在走，一直走到比方说今天早晨是共产主义，昨天晚上12点钟还是社会主义吧，一直走到那个时候一点也没停。但是它怎么到了零点零一秒钟就停了呢？走资派就不走了呢？走资派就变成无产阶级了呢？这是很神秘的，不可能的。如果他一

直都在走，走到昨天晚上12点，那么我可以肯定零点零一秒钟他还是走资派，他一点也不会停下来。这就是说阶级斗争是不能消灭的，因为走资派老要走嘛！那么现在我们问，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同志讲的阶级斗争是什么呢？什么是阶级斗争呢？就是打倒走资派，打倒反动的学术权威，夺他们的权、清洗他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据说，这就是所谓的阶级斗争。这就很神秘。过去我们知道的阶级斗争是奴隶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斗争，是农民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那是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斗争，这很容易理解，一看就清楚。现在不是这样，现在不是一个阶级反对一个阶级的斗争，而是少数人，是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对多数人的斗争，就是所谓反对走资派的斗争，打倒反动权威的斗争，夺他们的权。而且在他们中间互相夺权，还有反对保守派。“保守派”、“保皇派”大多数都是革命的对象，据说这就是阶级斗争。而且这种阶级斗争要每七、八年就要进行一次，据说这是命定的，因为，牛鬼蛇神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一定要跳出来，所以我们就每七、八年进行一次。如果我们问为什么刚好七、八年进行一次，而不是七、八个月才进行一次，也不是七、八十年才进行一次，那么这个问题是不能问的，因为这是非常神秘的，是不能说明理由的。如果提出这个问题来，那肯定在那个时候要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因为他就不能说明为什么要七、八年进行一次，不是七、八个月，也不是七、八十年。这纯粹是一种武断，是一种臆断，是一种历史唯心论。这个看起来情况是非常阴暗了，因为虽然每七、八年进行一次，但是阶级斗争依然没有变化，事情毫无进展，结果只好不停地每七、八年进行一次阶级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的循环论和宿命论的观点。竟然会作出这样的论断，就说明毛泽东同志他老人家已经没有对社会现象进行科学分析的能力，丧失掉这个能力了。认为天下大治必然变为天下大乱，天下大乱又必然达到天下大治，一治一乱循环无已，这已经完全回到历史唯心论里头去了。我们知道《三国演义》那个旧小说里头，一开头就是，话说天下久分必合，久合必分，这是一定之理。那么毛泽东同志重新陷于历史唯心论的这个循环论去了。总而言之，“文化大革命”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直接就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思想的产物，他是根据这个来行动的。

第二、“文化大革命”又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左”倾空想的产物。或者是“左”倾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物。在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论述的社会主义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的，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但是，1957年以后，他就逐渐产生了“左”倾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这种“左”倾空想的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脱离生产力的实际状况，脱离发展生产力的要求，认为只要不停地进行阶级斗争，不断地随心所欲地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能够消灭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和工资制度，而实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一切社会差别的社会平等的理想。所以我们说，这种空想的社会主义是“左”倾的。所以说“左”倾的，一个是不断地进行阶级斗争，另外一个是急于求成，就是一下子就跳到共产主义去，所以是“左”倾的、空想的。在发展的速度上是急于求成的。早在1955年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里面，就表现出了在短时间内就能够成倍地或者几十倍地发展生产力的空想。为了实现这种急于求成的想法，1958年1月就批判反冒进，1958年初进一步批判反冒进；1958年

中提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主观的先验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模式，1958年7、8月间提出了要在一年内实现钢的翻番、粮食翻番，在讲话中提出了对粮食吃不完的深深忧虑。晚上他讲，我昨天睡不着，有些话要对大家说，过去谁想过一亩地能够生产几万斤粮食呢？我是没有梦想过。怎么办呢？他提出解决的办法，恐怕这样下去，我们的十五亿亩地呀太多了，种三分之一，种五亿亩就可以了，另外三分之二拿来种草，还有三分之二就休耕，全国都搞成个大公园。他讲要实行吃饭不要钱，他提出了这个理想。而且在这个讲话里头，他大力抨击工资制度，说本来进城以后是不应该实行工资制度的，还是原来的供给制好嘛！我这样主张有些人说我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现在证明我是对的嘛！就应该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等等。1966年，作了所谓“五·七指示”，写给林彪的一封信，提出了一个人同时学文、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而且每一个人都要批判资产阶级，这就是说什么也不要学，什么也不要，什么也学不成、做不成。工人也不要做工，农民也不要种地，学生也不要学习，主要地是要批判资产阶级，这是一个什么思想呢？我看这就是认为这样做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我认为这好象是一种意味着同“穷过渡”，“穷拉平”并列的“白拉平”的思想。把大家没有文化都拉平，大家都不要学了，不要文化。1974年12月的理论问题指示，更加把他老人家要消灭商品、货币、工资这几样东西的意图说得非常清楚。因为他说，我们中国算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我们还存在着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八级工资制，这些都和旧社会差不多，所不同的，只是所有制变更了。对这一段话我们应该怎样解释？就是说，我们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因为都实行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八级工资制，所不同的呢只是所有制变更了。就是大的相同只有小的不同，只有个小小的不同，就是所有制变更了。由此可见，这个商品、货币、八级工资制都是很不好的，要尽量地快点把它消灭掉。但是，由于这些空想是不能实现的，因此，这种空想实际上不可能得到党内大多数人的支持。财政部也算了，想实行供给制，但是，算来算去觉得非常复杂，而且财政开支还要增加，不但不能减少而且还有增加，而且是个无底洞。你如果生子女就要给钱，补贴的话，这是不行的。总之，行不通。大家既然算来算去行不通就只好告诉他老人家这样做不成，不能实行供给制。因此老人家不高兴，认为大多数人是反对自己的，认为党政机构自己都控制不了了。这是他对斯诺的谈话，说在1966年我对党政机构已经控制不了了，等等。那么这大多数人，为什么不听话了呢？据说都是“官作大了”，这根据1976年4月四号的文件上讲的，都是官作大了，有既得利益要保护，都成了走资派了，成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了，甚至是成了睡在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那么怎么办呢？据说，一个工厂一个农村去搞，都不解决问题了，于是就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全面地公开地揭露所谓我们的黑暗面，于是他就号召“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方、各部门的代理人，夺他们的权，清洗他们，如此等等。那末这个“文化大革命”就发生了。为了实现他那个空想的目标，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是第二。

第三、毛泽东同志所以陷入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左”倾空想的社会主义的错误，是由于在1956年后，在国内外取得一系列巨大胜利、赢得巨大威望的情况下，他老人

家开始骄傲了，不谨慎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也脱离党中央的集体了。脱离到什么程度呢，脱离到这种程度，就是不和大家一起开会讨论问题，只是听汇报，只是必要的时候出来讲话。他话讲出来也不能变更的，变成这样一个情况。毛泽东同志一个人可以随便今天指责这个同志，明天指责那个同志，似乎人家都不对，只有他一个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别人都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批评得又很严重，实际上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最大的实际是什么？就是全国广大的人民要求消灭贫困、落后，改善物质和文化生活；要求安居乐业，不要再折腾了。解放以来，我们进行的运动太多了，一年一个，运动不断。这个时候人民要求安居乐业，不要再折腾了，一个要求消灭贫困落后，一个要求安居乐业，这是当时全国人民最大的愿望，也是最大的实际。但是，这些被毛泽东同志他老人家置于脑后，而且越来越置之不顾了。1958、1959年以后党内一批投机分子、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康生、陈伯达之流，大肆宣扬个人崇拜，把党和人民的一切功劳都归于毛泽东同志个人，把个人神化，把毛泽东同志塑造成为一个神，更把毛泽东同志推向更大的错误的境地。所以，为什么犯这个错误，那是因为他骄傲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了，就是这么个理由。

第四、发生错误的社会历史根源就是在于中国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长期统治的国家，一言堂、家长制的流毒影响到各个阶级，影响到各个社会生活领域。这是讲历史根源。另外一方面，讲社会根源。我国又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个体生产者的保守的农民象汪洋大海一样地包围着我们的党。他们崇拜权威，又用他们的绝对平均主义即农民社会主义的理想来影响我们的党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当毛泽东同志保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革命风格，保持着谦虚谨慎的态度和民主的作风的时候，那时他是搞五湖四海的，因此他就能够很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很好地代表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他就能够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经验和智慧，就能形成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反过来，当他骄傲，不谦虚谨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也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时，他就搞家长制、一言堂，他就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社会理想，而在很大的程度上代表农民的“左”倾空想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理想了。所以，讲到关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思想，是代表什么阶级，有什么社会根源的时候，我觉得恐怕很大程度上是代表农民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有的人说，毛泽东同志主要是封建思想，我看不对，恐怕主要是代表农民，而不是代表封建，当然也不能说他没有封建的东西，搞家长制、一言堂，就带有封建的成分。他的社会理想，他的错误，主要的错误思想代表的阶级是代表农民的。在1935年到1957年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同志是发扬民主的，是搞五湖四海的，是听群众意见的，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党的制度也是有不民主的毛病的。《党史研究》第二期第77页上，有一个材料讲：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了这样的决定，就是决定毛泽东同志担任政治局的主席，同时会议规定中央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规定书记处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一个人说了算，写到了决议上，应该说这是违反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怎么一个人能有最后决定权

呢？居然写到了决议上去了。这一段历史还发扬民主，但是，毛泽东同志他有那个权；有最后决定权。另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80页上说，在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同志有个批示，那个批示说，今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需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还说，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中央决议是大家通过，并经过毛泽东同志同意的，但是没有经过他最后核准仍然不算数，没有经过他最后批准，还是不算数，发出了就是破坏纪律。所以，党的制度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就是存在着使家长制、一言堂成为合法的那种陈腐落后的东西。这两个事实，都说明所谓最后的决定权，就是一个人说了算嘛！

第五、“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之所以发生，还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健全的政治理论和建党理论的影响这种因素。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首先是经过列宁、斯大林介绍的。列宁是个很好的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作风民主，非常尊重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的伟大的革命家。但是他也不是毫无错误的。他在沙皇专制统治下形成的建党思想，首先反映在《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这两本书里面的建党思想，过分强调集中而忽视党内民主，这在当时诚然是必要的，但在俄共成为执政党以后他也没有把党组织放在民主的基础上，甚至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的关系也采用集中制原则，高度的集中啊，实际上就是说各国共产党都要听共产国际也就是听俄国人的指挥。俄国共产党领导各国的党，指挥各国党的行动，这显然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同样，列宁的政治理论也是过于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镇压方面而忽视了民主方面。强调到这个程度，说无产阶级专政是铁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束缚的，也就是说，包括无产阶级自己的法律也管不着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法无天，不要任何法律。这就是过分强调了暴力的作用，强调了所谓不受任何束缚的作用。这样，就形成了党和政府的权力都过于集中，就是集中于共产党中央，最后集中于一个或少数几个领袖人物的现象。苏联就是这样的。因此长期以来在我们这些人看来，好象社会主义就是集权，高度的集权，集中于一个党中央，然后集中于领袖，这就是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要变成少数人的专制和个人独裁，就是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面。甚至当列宁发现斯大林权力太大，并滥用权力，想制止他和不让他当总书记时，他也无力加以改变，也改变不了斯大林这个滥用权力的现象，因为他自己的政治理论和建党理论就是那样的。而且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已经掌握了党的机器，列宁要纠正他也为时太晚了。这是列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某些不足之处。我这样讲当然有些同志会听不惯的，怎么列宁是革命的圣人你还说他有错误，你这不是大逆不道吗？我看，不要那么去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没有错误的，没有什么圣人，他比我们伟大的地方，不过是比我们看得更多、更高、更远，很多是正确的，错误少一些，如此而已。错误只有多少的不同，不会没有错误。因为他在那个环境里活动，他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也可以理解。至于我刚才讲的这些错误，算不算错误，大家可以研究。我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左派”幼稚病》这本书里头讲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那一段话讲领袖和群众的关系，经常被人家引用的那一段话说：群众通常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有政党来代表的，这个政党呢通常是由最有经验的领袖们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这里

头他强调了什么，领袖和群众的关系，就是领袖是少不了的，他强调的是这个，他强调的是领袖的作用，而不是群众的作用。那么在科学上列宁的这段话，对领袖和群众的关系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应当说问题是没有解决的。因为他针对“左派”攻击党的领袖来说的，所以他强调领袖的作用，那么他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吗？领袖从那里来的，领袖如果不代表群众，难道群众没有理由把他抛弃掉吗？所以列宁的这个《“左派”幼稚病》这一本书里头关于政党、领袖和群众的这个关系在科学上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前进一步。列宁还有其它的问题，我就讲这个权力过于集中，我们的权力过于集中，从哪里来的？从老祖宗那儿来的，我们追根追到列宁那儿去，岂不是对他老人家有点不尊敬？我们大家可以研究，我现在是这样看的，大家可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中国党是学习俄共的，学习列宁、斯大林的，尽管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干涉（这种干涉都是错误的了），作了坚决的斗争，因而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后来又同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此捍卫住了中国的独立和社会主义事业，立下了很大的历史功绩；但是，另外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又学习和继承了苏联的党和国家都由个人集权的制度和斯大林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的方法。这就势必造成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不正常，造成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以及社会主义法制的被破坏，因而成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研究“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的话，如果我们不把国际的因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消极的传统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里头的缺陷也拿来分析的话，那就是不完全的。我们就还是走不出斯大林把我们引进的那条死胡同去，就是个人专断，一个人说了算，那种权力过于集中的错误制度，集权的政治制度。

“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是非常丰富非常深刻的。这种教训是什么呢？也就是叶剑英同志去年的国庆讲话第二部分里头已经讲了的四条教训，现在重新简单地重述一下，可以这样说：

（1）在无产阶级民主专政建立和巩固以后，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必须把全国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一定要实现这个重点的转移。“八大”有关这个问题的决定是正确的，后来抛弃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否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已经解决，说这个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又转回去了，不是重点又转移了，还是搞阶级斗争啊。四中全会就做出这样的决定，除非遇到大规模的外敌的入侵，在那种情况下当然还要进行各种必要的经济建设，除非是发生了这种意外情况，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动摇，都不要动摇全国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这是第一；

（2）要正确地分析国内的政治形势以及阶级形势，严格区别两类社会矛盾，经过法律程序来处理作为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和其他严重犯罪事件，保持为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长期的社会政治安定，这是对于阶级斗争问题要正确的理解。刚才有一位同志问我，1956年以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应该怎样看，我个人认为，在党的文献上边也是清楚的。这个在56年后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内部矛盾了。人民内部矛盾当然它有个中心，这个中心是围绕着要不要迅速发展生产力，实现经

济的现代化和政治的民主化。要不要这样做，怎么做法？围绕着这个问题，要不要实行四个现代化以及政治民主化而展开的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主要矛盾。比方说我们同主张“两个凡是”的人的矛盾，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说是阶级斗争，我看可以不必，而可以看作是一种人民内部矛盾，不过是相当严重的人民内部矛盾。他坚持“左”倾错误路线，我们主张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这个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不要我们搞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我们要搞，这就有很激烈的斗争。它也可以说，这个矛盾反映到发展生产力，就是社会同自然的矛盾上头去。我们要主张发展生产力，毛泽东同志讲的就是向地球开战。今后的重点在这里，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的是向地球开战。也就是改变我们经济和文化落后的状况，同人民要求迅速克服贫穷落后，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之间的矛盾。总而言之，我觉得把这个矛盾概括成人民内部矛盾，好象比较好一点。因为我们讲的就是社会间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人的斗争问题。阶级斗争结束以后，人和人中间也还有斗争的，还有团结的。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了。主要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矛盾不是对抗性的，通常不是对抗性的。用说理的方法、民主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个时候还存在的敌我矛盾，阶级斗争的因素，就要通过法律的程序来解决。什么地方发现了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就用法律的办法来处理，用不着在全国发动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大家都来讨论都来找阶级敌人。以后再不要这样折腾了。这是第二。

(3) 实现党的民主化和国家的民主化，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建立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个制度必须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必须实现从下至上的全面的民主选举制和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有效监督；必须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表决制。

(4) 要正确处理政党、领袖和群众的关系，坚决实行集体领导和集体交班、集体接班制度，坚决反对和防止个人集权和专断，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和个人交班、个人接班的制度。用一切办法来保障群众充分发挥历史首创精神，用一切办法来保证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执行群众的意志，保证他们始终做人民的忠实的勤务员，防止他们从人民的勤务员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要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这里面就牵涉到改革和完善我们的生产关系，改革和完善我们党的制度，国家政治制度，改革和完善我们的思想文化上层建筑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苏联变修变质的惨痛的教训，以及所谓“文化大革命”的痛苦的经验，的确使得我们对什么是专政、什么是民主，以及怎样建党、怎样建政等等许多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新的觉悟。使得我们懂得必须从斯大林引入的社会主义的死胡同里边走出来，那条死胡同使得社会主义变质变修，而寻找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健康道路。

在讲第三个问题前，先回答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五七年以后党内是不是有一条正确的路线？这条正确的路线是代表哪些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内有没有一条正确路线？这条正确的路线是代表哪些人？这些问题怎么看呢？在这个期间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是这样：是有一条正确路线，这条正确路线就是“八大”和“八大”以前形成的党的路线。除此以外还有没有另外的正确路线呢？我看没有。“八大”和“八大”以前的正确路线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形

成的，他是这条正确路线的代表，或者说是集中的代表。后来他离开了这条正确路线，另外提出了“左”倾的路线，这就造成了一种复杂的情况。另外有一些同志在不同程度上还坚持原来的正确路线，认为应该按照党原来形成的路线办事，因此发生了矛盾。凡是提出这个意见的同志都在不同程度上代表或者坚持党和毛泽东同志原来的正确路线。比如彭德怀同志，他提出的意见书，就是坚持党原来的正确路线，认为那样做不行。你说他另外提出一条什么路线吗？没有。又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某些时候看得很明显，一是“二月逆流”的出现，这些同志包括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同志，他们批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如打击老干部，不要党的领导等等，认为这是违反了毛泽东同志原来的正确路线的。可见他们还是站在原来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上，来批评、批判“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路线。所以，没有另外一条正确路线。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以后，周恩来同志取得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主持党中央的工作，他就着手恢复党的固有传统，解放干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经济政策，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取得了很大成绩。毛泽东同志开始是允许他这样做的，后来就不高兴了，因为他恢复了原来的正确路线。毛泽东同志就批了右倾回潮，后来又发动了一场批林批孔的斗争，反对周恩来同志，可见周恩来同志是坚持毛泽东同志原来的正确的路线，“八大”的正确路线。再一个例子，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后，他提出要整顿各项工作。怎么整顿呢？按照“八大”的正确路线来整顿。当邓小平同志着手恢复党的正确的路线，即“八大”的路线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不高兴了，就发动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把他搞下去了。所以，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都是代表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这条路线就是毛泽东同志原来提出的正确路线。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看呢？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背离了的“八大”的路线。当然，的确不但恢复了，而且向前发展了这个路线。关于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能象历史上那样，象同王明路线斗争那样，一面有毛泽东同志的路线，一面有王明路线。而现在的情况大体是，毛泽东同志原来的正确路线和毛泽东同志后来的错误路线之间的斗争，不过，后来毛泽东同志支持了错误的路线，另外的人还坚持他原来的正确路线。

第二个问题，右派不叫“平反”，叫做“改正”，“改正”与“平反”有什么区别？回答：没有区别，是一个意思。起草文件时大概是考虑到毛泽东同志原来说过，反右派斗争没有平反的问题。好，你不叫“平反”就叫“改正”，反正是一样。

第三个问题，五六年以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我已经讲过了，我认为是人民内部矛盾，阶级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人民内部矛盾围绕着要不要搞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展开的矛盾。这是主要矛盾。主张这样搞的，那就是人民内部的先进的思想，革新的思想；反对这样做的，是落后的思想，守旧的思想。他们之间的矛盾，每天都可以看得见。有些人不愿前进，还想回到过去那种错误的路线上去，因此就同其他同志发生了矛盾。这个人民内部矛盾，集中反映在人民要求迅速发展生产力，为此目的就要实现高度的民主化，这样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是人民的要求，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吧。可是另外一些人呢？他们不主张这样做，还是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宁可穷一点，却要搞得很纯洁，一定要坚持毛主席那一套；以阶级斗争为纲，基本路线，继续革命。现在

有的同志认为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怎么放弃了阶级分析呢？就是反映这种看法的。还有一个问题：说《人民日报》刊登的北京市某人民银行贷款，搞缝纫业，引起很大的争论，问是否现阶段允许剥削的存在？由于雇工使他收入比原来有很大增加。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我不能答复。即使他请了一两个帮手，有一点剥削，大概也不够叫做资本家，也不能看作是剥削分子。当然剥削分子我们是要反对的，特别是党内的蜕化变质、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所有这些都是非法行为，是我们禁止的。至于外国资本家拿钱来办点企业，即使有点剥削，也是允许的。

下面回到我们的正题，还有两个部分：

三、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这部分马齐彬同志已经在这个会上作了详细的讨论，讲了三个半天，我就不多说了。我想讲一讲或许可以帮助同志们进一步了解问题的一些意见。

今年六月十三日，胡耀邦同志在回答南斯拉夫记者关于“毛泽东主席对‘文化大革命’是否要负责”的问题时说：“我看应该。我们党中央一直这么讲，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中国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但同时在晚年犯有错误，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幸。”这是对于毛泽东同志一生的正确评价。对他的功绩不抹杀，对他的错误也不隐瞒。

他在六月十六日的一个内部讲话中又说：在毛泽东同志处于中央领导地位以后，“一九三五年以后，一直到五十年代初期，毛泽东同志是不搞一言堂的，是搞五湖四海的，是听群众意见的。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党，对中国革命，对中国人民，作出了伟大贡献。对于这一点，我们永远不会抹杀的，也不应抹杀。抹杀了就是违背历史，就要犯错误。毛泽东同志在后期，在晚年，的确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了许多不幸，功是功，过是过，实事求是。这样我们才能站得住脚，才能对得起我们的子孙。”

确实，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它已经写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他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作出了重要贡献。那时他调查研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和农民运动的发展，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他和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陈延年等许多同志一起同陈独秀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了斗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前期，他总结全党的斗争经验，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这就是在农村搞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后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期间，他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成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一整套理论、路线和策略，指引全党和全国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以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道创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军队，经过许多曲折，战胜了错误路线，形成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遵义会议以后，他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红军胜利完成了伟大的战略转移——二万五千里长征。接着，又领导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打出了一个新局面，空前地壮大了革命人民的力量。

量，为夺取全国胜利创造了条件。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不顾斯大林的反对，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战略决战，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又领导我们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胜利地建立、确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迅速恢复了遭到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个期间，他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增加了许多新东西。

总起来说，从1921年到57年的三十六年间，尤其是从1927年到57年的三十余年间，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极其光辉的。但是在后期，在1957年到1976年他逝世前的二十年间，毛泽东同志犯了1958年到60年和1966年到76年两次大的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了许多损失。不过在后期，他在领导我们同苏联霸权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和建立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他的后期这段时间，他的错误很大，但还是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在国际方面。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无疑是功大于过的。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样说，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能够接受。至于错误的百分比占多少，那就不必去争论了。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总结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建立和发展了作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马齐彬同志说过了，我就不多讲了。

我这里回答一个问题：什么叫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是指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是符合实际的那些科学的原理和结论的总和，而不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每一句话、他作过的每一个决定。那个东西不构成毛泽东思想。我们讲的是科学体系，是正确的东西，我们讲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如果离开了马列主义，不是这种正确的结合，而且经过实践检验是错了的，那当然就不包括在内。还有，我们讲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它要成为一个体系，那是一个什么体系呢？讲的就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体系。中国革命是有一套理论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逐渐在形成一套理论，社会主义改造是有一套理论的。这不是一个体系？恐怕是一个体系，我们看《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论人民民主专政》，是在阐述一个观点，阐明中国革命，包括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这个体系。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理论，那是很完备的，无可否认的。也包括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我们社会主义改造这个理论也是正确的，而且也是比较完整的。我想是在五七年以前形成的。社会主义建设他也提出了很多正确的思想，比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关于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法，这些都是正确的思想。再如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等一系列的思想。我讲是正确的部分，错误的当然应该排除。正因为这样，我们给毛泽东思想下的定义，我们要坚持的，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他的科学的东西，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的东西，是他的科学体系，所以当然要把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以后断续地提出的那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理论观点、形势估计、政治口号和方针政策都排除在外。有些同志对这一点想不明白，认为毛泽东同志就他的思想，他的言

论来讲，包括了正确的部分和错误的部分，为什么你要把他的错误部分排除在外呢？我看是这样讲，我们所讲的毛泽东思想，我们是对他下过定义的，并不是说毛泽东同志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毛泽东思想，那样我们就没法坚持，那我们就把错误的东西也加以坚持了，那我们干脆就别坚持了。相反地，如果我们因为毛泽东同志言论里面有些错误的东西，我们就提出连他的正确的东西也丢了，他原来提出的科学的东西也不要了，这对不对呢？我看也不对。所以应该把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分开，很明显地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不分开，我们如果要囫囵吞枣，那末我们只能制造我们自己的混乱，或者是坚持他的错误东西，继续搞“两个凡是”，或者是否定一切，把毛泽东同志总结我们党的经验，我们党的理论这个宝贵的财富，也把它放弃掉。这个我认为都是不可以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好好研究清楚。一定要分开。之所以要分开，不仅是我们斗争的需要，而且也是合乎逻辑的。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原则是坚持什么？难道不是坚持它的正确的科学的原理吗？是不是把马克思列宁那些错误的东西我们也要坚持呢？比方说马克思对形势的估计有的时候也是错误的，我们是不是坚持那些个别的结论、错误的东西呢？我们是不是要坚持列宁的那些主张个人集权的错误的东西呢？我觉得我们现在要这样提出问题，那些是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可以说，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的，那些我们是要把它抛弃掉的。但是我们还是承认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列宁主义，同样还是有一个毛泽东思想。不能因为它包括了一些错误的东西，我们就不坚持了，不能这样。

那么我们讲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到底能不能举出一些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的贡献，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和一些同志认为至少可以举出以下几项：

第一，他创立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

第二，他创立了关于从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独创性的学说。

第三，他创立了关于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科学理论和战略战术。

第四，他创立了关于统一战线，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时期都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学说。

第五，关于建党思想，他提出了在农民占人口大多数、工人占人口的少数的落后的东方大国里，怎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政党的学说。他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中心环节，并且提出了整风的方法作为实现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办法。

第六，他创立了用逐步过渡的方法去改造中小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用赎买的办法来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改造，当然，马克思没有试验的机会，列宁也是在没收以后才提出这个问题，但在苏联也没有成为事实。只有中国才这样做了，采用了一系列逐步过渡的办法，而且做得很成功。

第七，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和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这也是毛泽东同志独创性的贡献。这个理论的提出影响很深远。列宁有没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呢？从内容来说他是有的。我们看到他论工会工作的文章，讲到可能工人阶级的某些部分要同管理国营企业的经理人员和国家机关的利益发生冲突，这就是所谓人民内部矛盾了。工会的任务就是要用工会所能采取的办法，同国营经济来谈判并

对工人进行说服，来解决这个矛盾。解决矛盾的方针，就是维护工人的利益，实现工人那些合理的又能办得到的要求，纠正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和不合规定的做法。另外一方面，又使得这种解决无损于其他部分的工人和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因为只有这种发展才是工人的物质福利和精神福利的基础；而且工会还应该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你看这不是列宁关于工会在处理社会主义企业中间工人同国家的这种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针吗？当然，他没有提出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概念，直到毛泽东同志才正式提出这个名词。这是影响很深远的理论。当然，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是不是已经完全解决了呢？那也不一定。比方说，毛泽东同志喜欢说“团结——批评——团结”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可是仔细分析一下，光靠“团结——批评——团结”，人民内部矛盾还是处理不了。如果是利害的冲突就不能光靠这个原则。比方说，工资长期没有增加，农产品价格太低等等一些问题，用“团结——批评——团结”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还得有些别的一些原则。如实现高度的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按劳分配、统筹兼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双百方针等等原则。毛泽东同志没有把这些原则归到处理内部矛盾的原则中去，虽然这些方针也是他提出的。

第八，他在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方面，提出了中国的经济建设要从中国的特点出发，着重以农业为基础，要探索中国自己工业化的道路等等。

第九，他在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运用于革命斗争的战略战术，运用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也做出了富有创造性的贡献。

所有这些以及其他理论贡献说明，毛泽东思想作为伟大的中国革命的理论表现，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的存在，也是一个客观的现实的存在。因为我们党，我们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都在按照毛泽东思想来做的，甚至我们很多的语言，例如正确处理人民矛盾，“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走群众路线，这些都在实践中按毛泽东思想来做的，这不是现实的存在吗？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干部，现在还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到底有没有毛泽东思想，我看不必争论了。他是一个现实的存在，也是一个历史的存在。

毛泽东思想主要是论述有关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他没有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说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比方说不能讲是什么第三个里程碑，诸如此类。但是毛泽东思想确实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做出了新的贡献。

毛泽东思想是在同把马列主义教条化，也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教条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在困难的条件下，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寻找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那么革命事业就不能这样顺利迅速地取得胜利，或者是会使革命的胜利推迟。

在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我们认为有三个根本的原则，或者说三个根本的出发点。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自力更生。这三个根本原则，马齐彬同志已经向大家介绍过了。对于这三个原则应该怎样理解呢？我还想做一点说明：

（一）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的思想原则或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说得详细一点，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经过实践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一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这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路线。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凡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正确地认识客观规律，就能够按客观规律办事，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胜利。凡是违背这条思想路线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正确认识客观规律，就会在行动中违反客观规律，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失败。毛泽东同志自己后期所以犯错误，归根到底也是由于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这条思想路线。这就证明，这条思想路线是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违反的，否则，就会犯错误，就会失败。这就证明毛泽东思想是科学，是我们为了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所必须遵循的。

(二)群众路线的原则。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认识路线和工作路线，就是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依靠人民的群众路线。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是我们根本的立场和根本的出发点。广大的人民群众不仅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而且是我们的智慧，也就是正确思想的源泉。因此，我们必须时时刻刻保持和人民群众密切的联系，任何时候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这是一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和工作路线。历史的经验证明，革命的胜利和建设事业的发展，都是由于联系群众，执行群众路线而取得的；反过来，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失败，都是由于脱离群众，违反了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自己后期所以犯错误，归根到底，也是由于脱离群众，违反了群众路线。这就证明，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路线是科学，是胜利的保证，是我们为了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所必须遵循的。

(三)毛泽东思想在处理中国和外国关系问题上的根本出发点或者根本原则，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简单地说，就是自力更生的原则。这是从上面所说的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依靠人民必然得出的结论。它们之间是有密切的联系的。我们要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实际，当然主要靠自己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才能认识；我们只有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取得胜利。我们干革命，搞建设，都要争取一切可能的外援，学习外国一切好的经验。采取慈禧太后的那种排外的态度和闭关锁国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决不依赖外援，我们始终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这很简单，我们是一个近十亿人口的国家，我们要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能依靠人家的一点贷款吗？得根据我们的条件，吸收一点外国的资金和学习外国的技术，始终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历史的经验证明，在世界上存在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时期内，只有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才能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才能维护我国独立和社会主义事业。而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又是同坚持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在几十年间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各方面实践经验所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和党的工作六个方面一系列的科学原理和基本政策，都是有长期重要的指导意义的。我就不多说了。

列宁说得对：“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用先进的理论武装起来的党，才能起先进战士的作用。”“而正确的革命理论……并不是教条，它只有密切联系真正群众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才能最终形成。”所以有的同志说，今后是不是可以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词，光用马克思主义就行了，我看是不行的。因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我们得到的一个成果，我们是不能放弃的。再说，如果光是把马克思主义搬进来就可以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岂不是太简单了，那王明也可以当领袖了。思想的成果，不管是谁

首先总结出来的，都是我们的财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的财富，是我们自己的，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是我们中国人民自己的利益要求我们要坚持毛泽东思想。

确实是这样。拿俄国来说，俄国革命所以取得了胜利，就是由于有了按照俄国的条件具体化了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这个理论，列宁把它叫做布尔什维克主义，说它是1903年开始形成的；后来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把它叫做列宁主义。不管叫什么名字，这个理论的存在是客观事实。

同样地，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了胜利，是由于有了按照中国的条件具体化了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这个理论是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形成起来和发展起来的。这个理论，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从1945年党的“七大”以来，这个理论是以毛泽东思想命名的。不管我们把这个理论叫做什么，这个理论的存在是客观事实。

这个理论以毛泽东思想来命名对不对呢？是对的，刘少奇同志在“七大”时提议使用这个名词是正确的。因为尽管这个理论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列主义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的总结。尽管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同志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各自在许多方面作了重要贡献，为我们党的理论这部机器制造了不少部件和零件，但是大家都承认，对于这个理论，贡献最多最大的还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理论机器的总工程师或总装配工人。因此，用毛泽东思想来作为我们党的理论的名字是正确的。

中国革命违反共产国际和苏联人的意志，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这是世界革命史上了不起的大事，是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世界政治中最重大的发展。象这样历史上空前广阔、深刻的革命变革，怎么能不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向前推进呢？反映了从1921年到1976年五十多年的历史，尤其是反映了1927年到1957年三十多年光辉历史的规律性变化过程，反映了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和丰富传统的我们党的理论，即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它的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崇高的历史地位，怎么能够不承认，怎么能加以抹煞呢？

我们要反对在中国的革命经验、革命传统和革命理论方面的虚无主义，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国的革命经验、革命传统和革命理论，继续高举中国革命理论的旗帜、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我们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就要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包括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了不幸的那些错误的理论和错误的实践。有的人问，毛泽东同志错误的理论是什么呢？主要的就是他的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的理论，就象我们前面讲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关于所谓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这种看法，以及他的“左倾”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所有这些，我们要把它排除掉。这些错误的东西，概括起来，就是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左倾”空想的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论，这两点大概可以这些东西基本上包括进去。我们要纠正，要抛弃这些东西。反过来说，我们只有纠正毛泽东

同志晚年的归根到底是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那些错误的理论和错误的实践，才能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才能维护毛泽东同志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和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旗帜。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就是我们在一切问题上，也包括在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是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下面讲第四个问题。

四、沿着党所选择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前进

这里讲的就是根据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阶段的两个曲折的丰富的正反经验的认识，今后发展的道路是什么？这是讲我们今后发展的道路问题。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中央真正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真正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真正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正如叶剑英同志在去年的国庆讲话中所指出的，他说：“我们党中央对过去一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论观点、形势估计、政治口号和方针政策作了改变和调整。”这里所讲的就是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那些错误理论观点等作了改变，今后也不能这么提了，也不那么做了。另外一方面，他指出在全党全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国内阶级状况的分析、经济文化建设的方针、任务等重大问题上。这里举的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全党全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第二个是国内阶级状况的分析，第三个叫做经济文化建设的方针任务，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上，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新论断、新决策。作出这样新论断、新决策，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发展了马列主义的。

我们的党现在选择了这么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可以这么说，就是充分依靠人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从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从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过程中，从反复总结历史经验中得出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所制定的党和国家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可以这样来概括，这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有计划、按比例、多快好省地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党的这条总路线和总任务，规定了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当前历史阶段的奋斗目标，以及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所采取的基本政治方针。

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规定和58年的总路线不同了，那个总路线只是笼统地要求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规定和四中全会通过的国庆讲话的提法比较，也改进了，因为去年国庆讲话只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没有提政治上的高度民主和文化上的高度文明这两项重要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

“现代化”就是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方面的现代化，这是对经济、国防和科技建设的要求。现代化的基础和中心是经济的现代化。高度民主，就是比资产阶级民主高得多的、能够确实保障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他们行使管理国

家和管理企业事业的权利，并且保证全体人民每个人的自由和民主权利的社会主义民主，以及确保这种高度民主制度的贯彻实施的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这就叫做高度的民主。这是对政治的改革和建设的要求。这个政治制度上的高度民主化，是为了保障经济现代化和人民共同富裕生活的实现，同时政治上的高度民主和广泛的自由本身，也是社会主义建设最终目的的一个重要部分。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里头不是讲吗？民主看起来是目的，实际上是手段，因为政治是上层建筑的，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我们现在看来，这个提法，不太正确。民主又是手段，又是目的，它是我们达到经济目的的手段，同时它本身也是我们的最终目的的一部分。试问，我们人民难道光要生活富裕就行了？我们还要自由，还要广泛的自由，还要有高度的民主。这样，我们才能心情舒畅，我们大家都心情舒畅了，才能够生动活泼。所以高度民主也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我们的最终目的的一个重要部分。

“高度文明”，就是比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水平更高的精神的文明，它不仅在科学文化方面是比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水平更高，而且是具有资本主义制度所不可能有的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德理想，以及在这种道德理想引导下的健康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我们讲的高度文明就是说，一个高度的科学文化的水平，一个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德理想，一个健康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这是对文化的改革和建设的要求。高度文明是为实现经济上的现代化和政治上的高度民主服务的，同时高度精神文明本身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目的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极其崇高伟大的。为了达到这个崇高伟大的目标，党的总路线规定的基本政治方针，就是“团结全国各民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这么三句话。这个规定，是1958年总路线所没有的，同去年的国庆讲话的提法是相同的。

这个规定是什么意思？首先就是说，我们是依靠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来实现我们的目标的。我们要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用什么办法，就是依靠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这同时也也就是说，我们的原则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是依靠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来达到的。我们要争取一切可能的外援，利用一切有利的国际条件，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的经验，但是我们首先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次这就是说，我们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的和敌我之间的这两类社会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把它归纳一下，把毛泽东思想，把我们党中央现在的方针政策归纳一下就是这样：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政治上、思想上就要实行人民民主的原则（人民民主我们把它规定成为头一个原则）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在经济上，就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对于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以及各部分人民、各民族的人民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经济上是两个：一个是按劳分配原则，一个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这个方针是对谁实行的？是对于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以及各部分人民、各民族的人民来实行，就是说要调节他们之间的矛盾。在文化上，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里我们讲了四个方面，

六个原则，看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这样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因为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达到团结全国各民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尽可能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同心同德地来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目的。

为了达到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的，党的总路线规定的基本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针，就是“有计划、按比例，多快好省地发展经济和文化”。这个规定，和1958年的总路线不同，也和去年国庆讲话的提法不同，因为1958年和1979年的提法都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十二个字。现在的提法删去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种鼓动性的词句，而增加了“有计划、按比例”这样反映社会主义重要经济规律的词句。这是重要的经济规律，而且是首要的经济规律。经过这样的修改之后，就变成了“有计划、按比例，多快好省”这十个字的方针。我们基本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方针，就是有计划、按比例，多快好省十个字。

这个规定，首先就是要求我们遵循有计划、按比例这个社会主义首要经济规律，我们过去因为没有遵循这个规律，吃了很大的苦头，犯了1958年到1960年以及1966年到1976年两次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遭到了两次严重的挫折和失败。这两次都是由于违背了有计划、按比例的首要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犯了急于求成和主观主义、冒险主义的左倾错误，破坏了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就是积累太多了，积累率高达30%几、40%几，又破坏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适当比例关系。这同时也是由于脱离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而随心所欲变革生产关系，搞穷过渡、穷拉平的错误所造成的。为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和文化，现在我们党中央就决定要调整和改革经济，把积累率降到25%左右，认真地大力地发展农业，发展轻工业，坚决地缩短基本建设路线；在重工业方面，着重地发展能源、交通和建筑业。这个规定首先就是这个意思，要有计划、按比例。

其次是“多快好省地发展经济和文化”，就是要实行一系列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但是实践证明，只有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的前提下实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方针，才能真正做到多快好省。否则，如果违反有计划、按比例的客观规律，主观上虽然要多快好省，结果仍然只能是多快好省的反面——少慢差费。

根据这个总路线和总任务，党中央制定了通过调整和改革经济来达到持续稳定的发展生产力的方针，制定了同迅速发展生产力要求相适应，有步骤地改革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上的上层建筑的方针，同时坚持和推进党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的对外政策总方针。为了实现这一切基本任务，我们还要调整和建设我们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把党放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并通过党的民主化，达到恢复和发展党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提高党的战斗力的目的。

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正在通过修改党章、修改宪法和制定长期的经济建设计划，来制定详细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纲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纲领、军事建设纲领、外交政策纲领和党的建设纲领。所有这些工作，都要充分依靠群众和走群众路线，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经验才能完成。党中央已经决定在今年年底，召集六中全会来讨论和通过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明年上半年召开党的“十二大”，讨论和通过新的党章，制定国民经济计划草案，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草案，并且按照新的党章选举党的领导机关。在明年下半年召开五届人大四次会议，讨论和通过新的宪法，以及讨论和通过长期经济建设计划。

根据今年八月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随后举行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讨论决定，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就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已开始实行。今年是1980年，中国的农历叫庚申年（猴年），我认为这个改革可以称作“八〇改革”或“庚申改革”。我想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编年史，很可能要高度评价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头一年开始实行的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就是庚申改革。庚申改革的纲领，就是邓小平同志8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现在这个讲话中央已通知在全国非党职工中传达了。华国锋同志9月7日在人大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对于这个提纲也作了重要的说明。

关于所谓庚申改革，就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也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内容是什么？我想稍微多说几句话。庚申改革的实质，就是要实现党和国家的民主化。用这一句话就可以把它说完。邓小平同志8月18日的讲话，已经指明了这个改革的正确方向。关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一个是党的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说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是修改宪法，以便确定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我们到底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民主的制度呢？要在新宪法中体现出来。胡耀邦同志在9月间举行的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说：“宪法要大改”。我们的宪法只有1954年通过的第一个宪法好一点，以后，在“九大”以后、“十大”以后、“十一大”以后都修改过，按照耀邦同志的话来说是越改越不好了。我认为耀邦同志这个评价很对。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已通过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修改宪法的建议，成立了修改宪法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已经开始工作了。关于修改宪法的原则，小平同志在8月18日讲话中指出：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鲜明、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群众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利，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各民族要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要进行改善等等。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这是小平同志讲的一段话。

这里我想说说如何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尽一切的努力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迅速地健全起来，使它们成为有权威的人民代表的权力机关，这是我们的目的。在保证必要的中央集权的同时，要实行恰当的地方分权，使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有更多的权力处理地方性问题。尤其要采取有效的步骤，切实加强各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自治权利和加强民族的团结。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现在民族矛盾是比较尖锐的，特别是在西藏和新疆。我们要正确地贯彻我们的民族自治政策，来解决这个民族之间的矛盾。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说，可以这样设想：现在全国人民代表有三千四、五百人，开会只有北京这么大的会场才能坐得下，开起会来是非常困难的，要在大会上发言呀，除非是宣读宣言，实际上是不能进行讨论的，于是只得进行小组讨论。所以这么多人的代表大会呀，要举行或多举行，或者是要举行得长一点是很不方便的，因此可以考虑把人数缩小，也不能缩得太小，比如说缩小到一千人。从三千四、五百人缩小到一千人。这样缩小便于扩大民主，人数虽

少了，民主却扩大了。这样人数还是太多。另外还可以考虑把人民代表大会分成两个院，象很多国家分成上下院一样。苏联也分成了民族院和联盟院，我们可以采取这样一个方案，就是一个叫区域院，代表一个区域一个区域，代表地方的；一个叫社会院，代表各个阶层和各个职业的利益的。区域院人数可以少一点，三百人，这是区域院或第一院。第二院即社会院，人数多一点，比方说七百人。这两个院共同行使创制和立法的权力，同时监督政府工作，共同行使国家的最高权力。这样的人代会和它的两个院，互相制约，就是不能够一个机构说了算，这个机构如果作了错误的决定，另一个机构还可以纠正。这也便于一方面照顾各个区域各个地方包括各个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也能够便于处理各部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各个职业、各个阶层的人民内部的矛盾。两个院共同的职责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了便于及时地制定国家的预算和国家经济建设计划，及时总结执行计划和预算的状况和经验，恐怕今后会议要多一点，比方说一年开两次。会议应比现在长一点，现在开会一次个把星期、十天左右，实际上就是举手通过我们党政机关预先制定的一些法律。这样人家说我们人代会是“橡皮图章”，恐怕也差不多。苏联的苏维埃也是这样，党的机构把完全准备好的文件，到时候大家举手通过。当然光是开两次会还不够，还应加强它的常设机构，两个院都要有常设机构，而且应该精干，应该是强有力的。那么人数就要缩小。现在两三百人的常委会，也是不便于开会的，因此人数可以缩小到五十到七十个人，这样常委会就便于召集。现在的成员呀，大都是些七八十岁的老人，走路也走不动，两个人扶住，甚至会也不能参加。我们将来的常委会应当都是年富力强，能够坚持八小时工作的，他们应该是有经验、有一定水平，而且是年富力强的，并且是专职的，只做这个事，别的事都不做。部长不能兼任人大常委会的职务。常委会应是精干的，整年在那里干这样的工作，除了下去调查，就是开会研究问题，那么他从事这个国家的立法工作、各方面的方案，拿古今中外的作法加以比较，来保证实现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正象资产阶级的议会保证资产阶级的利益一样，我们是保证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利益。还有两个院都要设各种专门委员会，比如经济、财政、劳动等等。专门委员会应该聘请有关学者、专家作顾问，组成各种智囊团，这样就能够把全国人民的经验和智慧及时地集中起来，那样我国的国家权力机构就能成为有权威的有效的人民代表的权力机关。它就作这个工作，经常的立法工作，监督政府的工作。

就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来说，我们党必须同全国人民一起使我们的宪法和法律逐步完善起来，并且一定要通过百折不挠的斗争，使它们成为不可破坏的力量，形成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而且形成以后，不许任何人加以损害。我们要建立这样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可以说这样的法制原则有三条：

第一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和权力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不允许任何人有逃避法律义务和法律处分的护身符。

第二条就是每个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其他的公民权力要受到法律的保护。非法侵犯者必须受到法律的追究。这个好呀，过去在“文化大革命”中，随时都可以把你抓起来，随时都可以抄家，可以刑讯逼供，今后不能这样了。非法侵犯者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随便抄家抓人，我们公安机关就把他抓起来，从法律上追究他的责任。

第三条法制原则，就是司法人员审判时，只尊重事实，只尊重法律，不允许任何人干预司法人员的独立工作。一句话是司法独立，党委也不能干涉，法院作出判决无需送党委审查。党委没有这权力，党委只管政治领导，不管判决，不能干预司法的工作，这样才能实现司法的独立。

所有这些法制的基本原则，一定要成为全党全国政治生活中家喻户晓，人人遵循的常识和准则，要到处通行无阻。

第二，就是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实行党政分工。党和各种经济文化组织、群众团体、舆论机关等等的关系，也是实行党政分工。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都是用来实行个人专断、个人独裁的庇护所，都是破坏国家政治生活中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怎么改革这种弊病？拿党政分工来说，邓小平同志八月十八日的讲话指出了要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今后凡是政府职责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政府工作当然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下进行的。因此，政府工作加强了，党的领导也加强了。这就是说，今后政府的工作，都由政府独立负责地去办，而不是由党委或党委书记越俎代庖。党委应当管党委自己的事，制定和监督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管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和党的纪律工作。党也要从政治上领导政府工作，通过在政府中工作的党员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不是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党尤其是不应当干预政府工作的日常事务。只有这样，才能既加强政府工作，又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否则，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结果，这就只会既削弱政府工作，因为政府失去了独立负责工作的可能性，又削弱党的领导，因为那样党就陷入政府工作的事务中，不可避免要犯官僚主义、事务主义，从而削弱党的政治领导，削弱党委本身的组织、宣传工作。不是讲党不管党吗？因为党去管了政府的事，不可能把党管好，这就是不务正业。同样地，党应该保证各种财政经济组织、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群众团体和舆论机关，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领导下，如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正确，势必就不能领导，独立负责地和有效率地、互相协调地进行工作，并且为他们代表的群众的利益而竭尽努力。在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发生一些意见分歧是正常的，党和国家应当防止他们变成对抗，应当指导他们按照民主的方式求得合理的解决。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才是生动活泼的，而又尽量不发生分裂和混乱。

我们现在有工、青、妇、科、文的群众团体。工是工会，青是青年团，妇是妇联，科是科协，文是文联。过去也存在党包办代替群众团体事务的现象，因此使得群众团体成了党化的、官办的而不能代表群众利益的所谓的群众团体，也不能起党联系群众，并且通过他们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作用，比如工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却不让工人去选举，而由党组织随便委派和调动，这样它就不能代表工人的利益。正如列宁所说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会仍然一定要维护劳动者的利益，就是维护工人的利益。他说：当着某一部分工人的利益同管理国营企业的经济人员，同国家机关发生冲突的时候，工会要通过同企业行政，国家机关进行协商或者谈判、或说服工人的方法来使冲突获得迅速完满的解决。一方面使工会所代表的工人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

同时要无损于其他人民和国家以及整个经济建设的利益。另一方面，要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特别是要进行关于工人阶级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以及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统一的教育。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当着担任工会领导工作的李立三同志和赖若愚同志要这样做的时候，要维护工人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专横无理地被判定为工团主义、经济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些帽子都来了。李立三同志是在1951年受到这样不公正的批判的，赖若愚同志是在1958年受到了同样的这样四项帽子的批判（李立三还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只是工团主义、经济主义。赖若愚呢，加上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他们受到相当专横无理的指责。这样只能使党和工会都丧失同工人群众的联系，使党和工会都脱离工人群众。这种左倾错误作法的本身就孕育着波兰危险。同志们都知道波兰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如不改弦更张，我们也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的。因此我们的工会和群众团体一定要实行民主改革，让工人群众来自由地、民主地选举自己工会的领导人和领导机关，从而建立工人群众自己的工会。他们一定要作为工人群众自己的忠实代言人，来独立地做好社会主义工会的工作。工、青、妇、科、文的群众团体都要做好社会主义群众团体的工作。党应该从政治上来领导群众团体，就是通过在群众团体工作的党员来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但是不能干预他们的日常事务，也不能随便任免群众团体的领导人。

现在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还没有建立代表他们自己利益的团体，就是还没有建立全国和地方各级的农会。现在有的外国朋友就提出这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建立农会？我认为这个意见很有道理。因为如果不建立农会的话，就不利于维护农民的利益，不利于加强工农联盟。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分为区域院和社会院两个院，而社会院是由各阶层各职业的人民选举的代表组成的。我看建立独立的农会——中华全国农民联合会或者是中华全国总农会，以及各级地方农会恐怕是势在必行。过去有的人说不要农会了，因为全国人代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都是代表农民的。其实，人民代表大会不是代表农民的，它是代表全体人民的，代表各阶层人民的，农民还是应该有他的独立的团体才对，这样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的农产品价格长期那样低，剪刀差不但没有缩小，有时还扩大了，农民的利益不能维护，种稻米现在还不能收回成本，所有这些现象如果有了农会就可以避免了。

是不是让各单位各团体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下，独立负责地进行工作，并且建立全国和地方各级的农会，就会制造和扩大人民内部矛盾呢？我认为不会是这样的。恰恰相反，这是真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切实的步骤。

还有，就是党组织和各个舆论机关的关系，也是这样。党现已决定实行在原则上把一切情况告诉人民的方针，象万里同志在人大发言中所讲的，我们决定把一切情况告诉人民，包括财政赤字，去年财政赤字170多亿都公布了，不对人民保密了。我认为，为了使舆论机关能迅速有效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及时地把一切重要情况除了少量的关系国防外交的机密以外，都告诉人民，以及为了及时地反映人民对党和国家机关的批评建议，应该允许、要求和鼓励舆论机关和新闻记者、评论工作者独立负责地报道新闻、发表群众来信和发表评论。我认为这种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下的广泛的新闻自由和言论、出

版自由，对党和国家的民主化是至关重要的，这将成为促进党和国家民主化的一把钥匙，一个关键性的步骤。当然，舆论机关、新闻和评论工作者自己必须对党和人民负责，如果他们违反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令，他们应当受到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国家司法机关的追究。

第三，就是改革各个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制度。小平同志8月18日的讲话中指出，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别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还有党委领导下的校长、院长、所长负责制，也考虑同样有准备有步骤地加以改革。为什么要实行这种改革呢？因为过去实行的那种企业、事业的领导制度，名为党委领导，实际只是党委书记一人说了算的个人专断的权力过分集中的制度。而且这些党委书记大部分对于所领导的企业、事业，差不多都是外行，在这种情况下，党委和党委书记不可避免地要违背党的领导应当是政治领导的原则，而陷入他们完全不熟悉的企业、事业的事务中间，这样既削弱了甚至放弃了党的政治领导的责任，又削弱和妨碍了企、事业本身的行政领导和管理。而且这种实际上是党委书记一个人说了算的所谓党委领导制度，又是同企、事业的管理民主化直接矛盾的。应该是群众管理，不是由党来管理。人民是企业的主人。如果党来管，是上头委派的，那么群众就会把这个工厂当成不是自己的，而是别人的，这样作也是妨碍群众自己当家作主的。这种权力过于集中的不民主的制度，很不利于企业管理的现代化、科学化，也非常不利于企、事业管理的民主化。反过来说，在企、事业实行党政分工的原则，就能使企、事业行政管理人员独立负责地作好企、事业的管理工作，同时使企、事业的党委摆脱本来不应当由他们管的日常事务，集中力量作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监督工作。而作好这些工作，本来就是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他们的正业。当然这个改革事关重大，在新的制度条例制定出来以前，仍然按原来制度执行，不要搞乱。不过就是按原来制度执行，也一定要克服党委书记一个人说了算的毛病。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要走群众路线。

第四，就是实现企、事业单位管理的民主化和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的直接的民主。在经济改革中一定要把企业的自主权的扩大和企业管理的民主化结合起来。这里讲的企业包括农村的社队在内，只有把企业的自主权的扩大同企业管理的民主化结合起来，这样自主权的扩大才不是那种个人说了算的权力的扩大，而是群众的民主权利的扩大。小平同志在8月18日的讲话中说：在企业事业单位，普遍成立的职工代表大会和职工代表会议，这是早已决定了的，现在的问题是推广和完善化。这个话是因为职工代表大会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试行过了，后来就中断了，现在是要推广和完善化。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有权对本单位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决定，有权向上级建议罢免本单位不称职的领导人员，并且可以逐步实行选举适当范围领导人。显然，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将要选举产生民主管理本企业、事业的事务的工作的领导机关，就是由企业事业的行政领导人参加在内的企业事业管理委员会，从而使得职工群众真正成为各个企业事业的主人。

关于在基层实行直接民主，新的宪法将规定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在基层的政权和基层的社会生活中，要充分实现各个居住地区的直接民主，使得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实际上参与讨论和决定同他们的生活和利益直接有关的种种公共事务。这就是直接民主。企业

事业管理的民主化和在基层实行直接民主，是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坚实可靠的基础。采取这个重大的措施，也充分证明了我们党是完全信任人民和依靠人民的，我们党是忠实地为人民服务的。一切西方国家和一切名为“现实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国家，都不敢实行的。这一条是他们都不敢实行的，苏联现在知道他那个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他自称为现实的社会主义，但实际上是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他们是不敢实行群众管理企业和直接民主这一条的。他们害怕得很，从来不讲。但是我们就敢于这样做，而且一定要这样做。

以上就是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的几个重要的方面。我们这样来做，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所讲的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的轮廓是怎么样的。

关于党的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小平同志在八月十八日的讲话中，除了提出改革权力过于集中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这个总原则以外，还提出了以下两项具体的改革：

第一个，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改革。新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将不再是选举产生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的一个中央委员会，而是选举三个平行的、互相制约、互相监督的委员会，就是三个都是中央的委员会。邓小平同志在八月十八日的讲话中说，中央已经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考虑再设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再考虑，也许不叫这个名称了，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国务院也要考虑设立相应的机构。这样就可以让一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行年轻化。

我认为，采取这个措施，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这样做有利于克服党的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病，这样做本身就是在中央领导机关内部实行适当的分权，使三个中央机构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以便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共同正确地行使党的最高领导权。我们看，人民代表大会准备分成两个院，国务院也准备设立监督顾问的机构，或者叫做咨询委员会，或者叫做顾问委员会。国家司法机关原来就分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他们也是互相制约的。这些都是同样的，是适当的分权，互相制约，以防止滥用权力的正确措施，防止任何一个机关滥用权力的正确措施。民主就是多样化的协调的统一，社会主义民主的这种多样化的协调统一的机构，将形成为一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防止社会主义发生变质、发生对抗和意外事件的“自动调节系统”。我们就是要建立这样一个“自动调节系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自动调节系统”，和防止、纠正错误的“自动调节系统”。反过来说，党和国家权力过于集中，实际上只能是机械的形式上的统一，和压制人民的多样性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的官僚主义和专制主义。形式上是统一，非常集中而实际上是个官僚主义、专制主义，实际上这也是软弱无力的。这种权力过于集中的制度，是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民主原则根本对立的，是格格不入的，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相违背的。

有些同志认为，这三个中央机构应当根据他们的不同职能，分别的给它另外取一个名字，比方说原来的中央委员会可以改名为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个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用过的名字，它的职责就是执行全国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所以叫

执行，是个执行机关，相当于政府系统的国务院，是个执行委员会。第二个委员会，原来邓小平同志说是否叫顾问委员会，当然也可以改别的名字。我们建议称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因为它的职责主要的是建议、监察、检查、督促，起这么个作用，是个监督机构，监督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是由一些老一辈革命家，经验丰富的还能够工作但是身体已经比较弱的老同志组成的，他们每一个人好比说都有一个龙头拐杖，像余太君那样，一百岁了，组成为中央监察机构。如果中央执行委员会有错误，他敲他那个龙头拐杖，说不行不行，这个是错的，这个要纠正，让他起这个作用，让他敲警钟，纠正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错误。中央执行委员会下面要设立一个常委会，可以不再设政治局了。政治局，过去列宁设立的时候是跟组织局对称的，所以有个政治局这个名称。后来组织局都没有了，怎么还叫政治局，这是不通的，叫常委会就行了。常委会里头也不需要再设什么小常委会了，由中执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一个常委会，还有一个中央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与此相应，中监会也选举产生他自己的常委会，这个常委会他的权力也相当于中执会常委会，还设立他自己的秘书处，由比较年富力强的老同志担任经常的工作。第三个机构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它的职责就是搞好党纪，整顿好党风，监督和检查纠正那种违反纪律的现象，它的任务是很明确的。这三个机构共同都是对全国党代表大会负责。它们如果发生了争论怎么办呢？他们意见不一致，可以开联席会议，如果开联席会议又解决不了，就召开全国党代表大会。因为全国党代表大会是常任制，随时都可以召集，由全国党代表大会这个权威机关来作出决定。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党的领导，政治领导不会犯大的错误。有重大问题还可以提交全党来讨论。

在中央设立三个委员会的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和作用，就是在于这样可以使一些年老的、经验丰富的同志能更好地发挥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就是发挥他的长处，又不至于过于劳累。年老体弱了，这是他的短处，再要他整天在办公室坚持八小时工作，那就不行了。因此设立中监会可以扬长避短，可以起这个作用。另外一方面，就是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班子更精干，更有效率，并且逐步实行年轻化，避免使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班子老化和降低效率。现在越来越老，老得不得了，走路都走不动了，还在那儿主持工作，这是不行的。

第二个，是各级党委以及各个领导机关真正实行民主原则，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所谓真正实行民主原则和集体领导原则，主要的关键就是要实行表决制，民主的表决制，一人一票的民主表决制。邓小平同志说，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要明确哪些问题应当由集体讨论，哪些应当由个人负责，重大问题一定要由集体讨论和决定。决定的时候要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每个书记只有一票的权力，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集体决定了的事就要分工去办，各负其责，绝不能互相推诿。失职者要追究责任。

为了实现党的政治生活民主化，党中央已经决定，对党的十五大通过的党章修改案要作进一步的修改。新的党章除了要反映以上所讲的两项改革以外，还要确立以下的重要原则：

(一) 必须正确规定党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 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必须由共产党来

领导，领导应当有一定的权威，为此就要求领导的正确。任何领导总难免会犯一些错误，但是为了减少错误，并且为了防止错误严重化，应当使任何权威都有一定的界限，不能是绝对的权威。党对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这不意味着党的活动可以不受任何的约束，不能那样，而只要是这种约束是恰当的，它就能既不妨碍党的正确有效的领导，又能够在党犯错误的时候加以节制。首先，从党中央到党的基层组织的任何活动，都必须严格遵守自己和人民一起制订的宪法和法律，要在宪法和法律的限度内进行活动。否则，一定的国家机关和人民就有权予以抵制。任何党的组织和任何党的领导人如果违反了法律，就有权抵制他，反对他。这是一个原则，他们的权力不应该是无限的，它应该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它应该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如果违犯，人民有权反对。

(二) 必须加强党和其他党派和非党群众的互相团结、互相监督。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我们必须继续坚持，继续贯彻执行。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应当同党员一样，有职有权有责，党应当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使他们得到应有的工作条件。我们党要继续主动地邀请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协商重大问题，邀请他们列席党的一定的会议，由党的组织和他们共同商量解决国家生活中的问题，并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三) 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包括坚决贯彻党中央已经决定的防止任何领导者个人的权力过于集中，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少宣传个人等项原则。还要规定党的上下级之间的正确关系，下级只是在工作上服从上级，在其他方面，党员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没有什么上级的党员和下级的党员，他们应该是平等，不允许任何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不允许任何人享有党章、国法和各项制度规定以外的特权，等等。如果有些制度规定不合理，制度本身还要加以修改。此外，党的上级组织要监督下级，下级也要监督上级，在党的各种会议上，广大党员和下级组织有权对上级组织和任何一级领导人提出批评意见。我们要在党的制度上和组织机构等方面继续努力，采取加强监督的措施来防止各级党组织发生违反党纲党章的情况，一旦发生，能够比较及时地得到发现和纠正。

以上我们讲了庚申改革，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人担心这个改革是不是会流产，或者是怀疑它能否得到成功。有的人甚至把庚申改革拿来同1898年的“戊戌维新”相类比。他们说，现在守旧的力量太大，阻力太大了，如果改革的步子太快了的话，有可能要象“戊戌维新”那样，以谭嗣同等六君子的被杀害，维新事业的完全失败而告终。

这是对我们这个改革的前途不抱乐观，我认为这种类比是不正确的。发动“戊戌维新”运动的康有为、梁启超，他们依靠的是当时并不掌握实权，而是被顽固派的首领慈禧太后所掌握的可怜的年轻皇帝光绪，因此，掌握清朝廷的全部实力的守旧顽固派就能够轻而易举的把维新事业淹没在血泊中。难道1980年的情况同1898年相同，或者说是类似吗？

实行改革的阻力是有的，今后还会有。马克思早在1871年写的《法兰西内战》初稿里头，就预见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个复兴事业，“将因为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的反抗而被阻挠、被延缓”，所以这个改造和建设事业一定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个可以想得到嘛。我们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也仍然遭到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的反

抗，确实是这样。代表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的就是汪东兴一类的人物，他们阻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阻挠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出来工作，阻挠出版《周恩来选集》，阻挠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他们坚持“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前的左倾错误路线，继续推行现代迷信，大肆神化已经去世的和还活着的领导人，大肆宣扬个人交班、个人接班的错误作法，提出“两个凡是”，不允许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的指示、错误的决定作任何的改变。但是，事实证明，他们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做出的两个决定，就是直接违反毛泽东同志关于要火化，不要出全集的遗愿的。毛泽东同志曾经写过一个关于火葬的建议，就是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六日写的建议。这个建议最后两句话是这样讲的：“后死者一定要保证执行，实现先死者的志愿。”就是要火化，不许违反。在这个建议上毛泽东同志是头一个签名的，而且这个建议是他写的。为什么要违反这个？你既然要“凡是”，为什么要违反这个呢？还有毛泽东同志多次讲过，不要出全集，说他写的东西有些是对的，有些是不对的。为什么要出全集呢？毛泽东同志多次讲过，但是恰恰作出了要出全集的决定。所以我们看，所谓“两个凡是”，他们自己是最不“凡是”的。他们所谓的“两个凡是”，不过是欺人之谈。他们为了镇压广大群众在丙辰清明运动中就开始表现出来的要求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改革的潮流，竟然把群众的改革要求，作为反革命的谣言来追查。1977年的5号文件不就是这样的东西么？特别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就是史云峰等革命志士没有死在“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而死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使他们永抱终天之恨。是谁做这样的事呢？同时，不是偶然的，这个时期又一次出现了大冒进的企图和尝试，搞了一个所谓洋冒进，1978年搞了个洋冒进。这都是讲的阻力，我们碰到的阻力。但是结果怎么样呢？邓小平、陈云同志还不是先后出来工作了吗？天安门事件还不是平反了吗？《周恩来选集》上卷（民主革命时期著作的选集）还不是很快就要出版了吗？（年底以前大概可以出版）自以为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声势赫赫的汪东兴，以及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还不是下台了吗？事实证明，站在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方面、“两个凡是”方面反对改革的那些人和当年的慈禧太后很不同，因为他们违背全党、全军、全国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他们是非常孤立的。同他们相反，现在要求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改革的人们，因为他们代表了全党、全军、全国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是为着人民和依靠人民的，他们的事业决不会失败，不会流产，一定会逐步取得完全的胜利的。

庚申改革之所以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还因为它是彻底的、是能说服人的。马克思在他刚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写的《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里说过这么一段很有名的话，他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当然要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旦为群众所掌握，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理论要能够说服人，它就必须是彻底的，它就必须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九页）。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人，不是孤立的，乃是社会的人，这就是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庚申改革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改革，是来自人民，为着人民，依靠人民的，因此它是能够克服重重的阻力而取得成功的。

上面我们讲了今年八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有

什么内容，有什么意义，这些意见仅供大家参考。

党中央在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现在主要抓三件事：一个是抓经济建设，一个是抓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一个是抓选拔大批坚决拥护党的路线、具有专业知识和领导能力和年富力强的干部。邓小平同志在8月18日讲话中说，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应当努力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

一、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二、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健全革命法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击一切敌对力量和犯罪活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三、为了实现以上两个方面的要求，组织上迫切需要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

小平同志说，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这个目的。

实践已经证明，今后还将进一步证明，党中央抓这三个关键问题是完全正确的。粉碎“四人帮”四年以来的形势发展，使我们能够确信，我们党中央所选择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正在做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伟大事业。我们正在攀登从来没有人到达过的新高峰。我们将要用实践、用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我们近十亿的中国人将对人类作出应有的新的贡献。

同志们：让我们团结起来，沿着党中央所选择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奋勇前进！